

# 記憶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12月15日第31期  
总第177期

## REMEMBRANCE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177期

### 上山下乡专辑（一）

#### 目 录

##### 【专 稿】

- 马昌海 一部难得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口述史大全 2-23  
——读朱维毅《生命中的兵团》

##### 【述 往】

- 郭小林 除夕悲雪——孙阳武与诸排长 24-34
- 季超男 北大荒忆旧三则 35-42
1. 查夜
  2. “把×××揪出来！”
  3. “砸烂资产阶级糖罐子！”
- 黄东汉 起锚后补——生死兄妹情 43-73

##### 【重要启事】

- 本刊将于2017年实行会员登记制 74-74

##### 【来信选登】

- 一、关于会员制的不同意见：同意、反对、疑虑与建议等 74-80
- 二、野火度沧桑谈《记忆》 80-83

##### 【本刊声明】

【专稿】

## 一部难得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口述史大全

——读朱维毅《生命中的兵团》

马昌海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曾经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机械化农业生产集团，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知识青年群体。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5年9月推出的朱维毅先生所著《生命中的兵团》，堪称是一部难得的黑龙江兵团口述史大全。其内容详尽，面面俱到，难能可贵，拟不多见。

作者作为一个在山西榆次县下乡的插队知青，工程师出身的德国名校工学博士，以一个非“兵团”亲历者的“局外人”身份，三赴“北大荒”各农场，并走遍了大江南北的众多城市，探访当年的“兵团人”，包括知青、军人和老农垦职工200余人，千辛万苦地搜集和查询各种历史资料，历时三年，写出了这部黑龙江建设兵团口述史，确实值得当年的兵团人和插队知青一阅。这些知青的后代，也可以从这本详尽的口述史中了解父辈所经历过的那段难忘的岁月，增加对父辈的理解。所有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在这本书里了解到大量的珍贵史实。

### 一、资料丰富，填补空白

许多有关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事宜，在一般的回忆录是零散或缺位的，没有像这本书这样系统集中的专题叙述。

一) 全书首先回顾了从1644年清王朝建立到民国时期对东北地区开发的历史。而后的

1931年到抗战结束前的1944年，32万人的日本开拓团曾在东北掠夺了2000万公顷的农牧用地。在随后的解放战争期间，开启了对东北地区的军垦。至新中国成立时，黑龙江垦区已建立了60多个由军人主导的国营机械化农场，耕地总面积达1.4万公顷。随后，农建第2师（原解放军第97师）和铁道兵的7个师加一个军官预备队成建制的加入了东北农垦（这支经历过朝鲜战争的1.47万的铁道兵部队施工经验丰富，善于在艰苦和危险的条件作业，无疑是新中国铁路建设的生力军，让他们集体转业去开荒种地，未免可惜）。

作者对北大荒的概念做了精确的定义：这是对黑龙江北部荒凉地域的一个通称，它包括了嫩江流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三江平原、穆稜河与兴凯湖平原；小兴安岭、张广才岭、老爷岭、完达山等山地；从平原到山地过渡的漫岗和丘陵地带；还有这片广袤地区内的水域。

195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下达“动员十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命令。3月2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而后，8.15万名转业军人来到北大荒，其中尉官的人数高达6万。有史料说，这其中有不少人是由于其出身、亲属关系、原国民党军起义人员……等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被部队清理出来的。还有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或“右倾”的军队政工和文化工作者，各军兵种院校的军事、技术、医疗等诸多学科的教官和学员（页19）。但有些军官并非有什么政治问题，如洛阳步兵学校、石家庄高级步校等军事院校的学员。在大连第一海军学校航海系就读的120名学员和唐山航空学校的飞行学员，已经开始实习了，却被成批送去开荒种地。这些人，加上随行家属和非军籍人员，号称“十万转业官兵”。到1969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初期，“十万转业官兵”已不足3万人（页536），大部分已陆陆续续调离了北大荒，或回原籍重新分配了工作。留下的人则多数成为黑龙江农垦系统的各级领导者，在文革初期作为“走资派”受到批判和否定（页20）。

早期参加北大荒开发的近14万各路老兵，在兵团组建初期只剩下约3.5万人。再加上1966年3月由沈阳军区10769名复转官兵组成的两个农建师，根据兵团军务处1969年3

月的统计，复转军人的总数为 45845 人（页 536）。

截止到 1966 年文革之前，国家有计划投入开发和建设北大荒的人，大体有六类：复转军人、原国民党军人、大中专毕业生、从各地来的青年垦荒队、山东等关内外的城乡移民、劳改劳教人员。在兵团建立初期的垦区内共有 25.5 万人，被通称为“老职工”（页 533）。那些让初到北大荒的小知青极度失望的老连队（新建连队仍然需要白手起家），其物质条件远比老职工们来时已经好了很多。很多老职工是在马架子、地窝子之类最原始的居住环境下开始了在北大荒的创业。老职工是知青的引路人，兵团的特殊环境，造就了老职工和知青之间比农民和插队知青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使迥然有别的这两批人逐渐结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页 534-535）。本书对知青与老职工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生动的描述。与作为“过客”的 34.5 万知青不同，老职工被作者誉为“黑土地的脊梁”当之无愧。

建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直接原因是基于北疆战备的需要。本书也简单回顾了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和过程。（如果要想深入了解中苏关系演变的深层次原因，双方在其中各自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建议参阅沈志华教授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新华出版社 2007 年。）

以往的知青回忆，很少专门涉及文革中在兵团领导部门工作的 3500 多名现役军人。本书在第一章《将士三千赴边陲》、第四章《北疆布阵》、第七章《军人的新使命》、第十章《少帅建三江》，从整体上对这些军人的功过是非做了全面详细的介绍，填补了史料空白，对他们的功绩和积极贡献也表示了充分的肯定。这些军人中有些是按当时的标准，政治面目不够清白，部队不想留用而派往兵团工作的。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就曾明确指示：凡本人和家庭有重大问题者，一律不能留在军区机关（页 86）。但这些现役军人本身的素质和能力并不低，他们在兵团工作的 8 年间担负了三大任务：边防战备；组织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着手遏制了垦区的派性蔓延，启用原农场干部（一般担任副职）恢复生产指挥系统；安置和管理 70.7 万职工，包括 34.5 万知青（页 42）和原农场“老职工” 25.5 万人及其家属 10.7 万人（页 533）。只有军事化管理才能将几十万知青的行为纳入当时所需要的

秩序，这是农场当地的职工干部所难以驾驭的艰巨任务（页187）。

一般的北大荒知青，与在团以上机关工作的现役军人接触很少，很多知青对当年从军队带来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极左作风，对不懂生产技术的瞎指挥都表示了反感和不满。知青与现役军人结为莫逆之交的也不是很多，成了终身朋友的多是老职工，比如那些转业的老志愿军官兵。

不同的兵团知青，对北大荒会留下不同的印象。连队是兵团的基层单位，往往方圆百里之内，只有这一个连队，自成一个小小的社会。所以书中有一句话就特别贴切：在北大荒遇到什么样的连长、指导员，你就会对兵团留下什么印象。事实也常常就是这样。这些以转业军人为主的基层领导文化水平不高，不乏善良忠厚淳朴之人，但也有的人作风简单粗暴，欺辱、打击压制知青的事情亦时有发生。不论在哪个时代、哪种环境下，对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机制不完善，都会出现各种问题，兵团也不例外。

二）第三章《不打不成交》，专门讲了形形色色的知青打架故事，实为罕见。

由于文革前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和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种种弊端，给这一代青年人的成长带来了致命的弱点。当文革中的打人和暴行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标志、一种仪式、一种特权的时候，对这些施暴者所受的教育是有必要认真反思的。在那样的一种教育氛围中，一些十几岁的中学生开始形成日后红卫兵缺乏人性的情感模式：野蛮被看作革命者应有的勇敢。当这样一种情感和道德观念形成之后，他们便顺理成章地走向了文革造反的前列。文革开始两年后，数百万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们在城市里无所事事甚至惹是生非。当时的中学生普遍沾染了一种江湖气，一些人拉帮结派、划分地盘在“一方”游荡，时常发生打架斗殴。不少人甚至见识了血腥惨烈的武斗。

作者认为：文革的混乱重塑了年轻人的是非标准，改变了其行为准则。在人权被随意践踏、司空见惯的暴力行径普遍成为一种社会氛围的状态下，就很容易催生男孩们的好斗本性，并对此种心理行为缺乏自制和自省意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要被纳入相关的行为约束系统。当他们一旦面对艰苦、枯燥并充满未知的陌生环境，原先在城市里

所受到的约束骤然消失以后，他们就会以本能的方式来宣泄失落和绝望的不良情绪。而最自然的宣泄方式，就是文革示范给他们的拳脚相加；最自然的对象，就是在文化、习俗、方言上和他们有着鲜明反差的异地知青。

于是，以来源地来划分对抗阵营，就成了知青斗殴的一大特征。这种冲突很少有本质上的利害冲突和明确的政治经济诉求。在那个侵害人身违法的观念十分淡薄的年代，有些小伙子三句不和便选择肢体语言，以拳脚论高低。“小架天天有，大架三六九”。在各地知青混居的兵团社会里，有些知青甚至沿袭了文革中在城市里的旧习，把能打架而称霸视为树立威信、夺得话语权的有效途径，并因此洋洋自得。除了打架斗殴以外，一些知青初到兵团时，怠工、违纪、抗命等挑战秩序的现象也非常严重。所谓“不打不成交”，既反映了知青之间，也反映了知青和兵团管理干部之间的关系演变。

从地域上划分，哈尔滨的知青最能打架。哈尔滨市以中长铁路为界，路西叫“道里”，路东叫“道外”，“道外”的孩子比较野。家住“道里”和“道外”的这两部分人相互之间也打。其次爱打架的是天津知青。精明务实的上海知青打架也并不输于北京知青。从市中心静安、闵行区来的上海知青往往动嘴不动手，但普陀、闸北区的孩子，很多都是苏州河边的棚户区里长大的，打起架来非常厉害。浙江知青人少且分散，但也不乏好斗之人。

从年龄层次上看，老高中的知青较少参与打架斗殴，69届的知青年龄最小，最容易冲动。处于这两批人中间的老初中知青，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中更多地受到了野蛮暴力氛围的侵染，其阅历、学识、成熟度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均不如老高中生。下乡之初又正值身体长成之年，雄性荷尔蒙对情绪和行为的作用最强劲，因而颇具斗殴实力。这其中的北京知青比较显眼，他们往往政治敏感、能说会道，见多识广，以斗智为荣。文革中的北京使他们沾染了蔑视权威的习气，也不太把兵团的各级干部放在眼里。

不管从地域，还是从年龄层次上看，家庭教养和传统观念的约束，也是每个知青是否尊重人权和崇尚暴力的重要因素。

三) 在 34.5 万黑龙江兵团知青中，有 15.7 万 1969 届初中生，他们实际上只有小学毕

业文化水平。本书的第八章《“小六九”的成人礼》，专门描述了黑龙江兵团中这个最大的知青群体。

作者指出：69、70、71届初中生普遍缺乏中学知识和社会经验，基本不具备独立思考和设计生活的能力。与66、67、68届的“老三届”知青相比，这些“新三届”的孩子们在开赴北大荒时带有更多的盲目性，也更少有长期接受生活磨练的思想准备。他们在去北大荒时一般只有16岁，是在兵团长大成人的。中学时代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可塑性最强，其后就要进入人生定向的阶段。而“新三届”知青恰恰失去了激发潜在资质的重要时机。这些人是上山下乡运动最大的受害者（72届以后逐渐恢复了高中，稍微好了一点）。在同样的新环境里，“老三届”人可以依靠在中学教育中激发起的才干特质，找到其自身的特有价值，比如从事管理、技术、教育、宣传工作。而大多数“新三届”人却因知识和经验的薄弱，只能成为这种才智施展的旁观者而充当了农田劳作的主力。不论是推荐入学还是恢复高考以后，其中只有极少数人上了大学。而更多的人却被逐渐边缘化，在社会竞争中流入了弱势群体。

本书第九章《“老三届”质量》，专门讲述了在黑龙江兵团的12.6万文革前的“老三届”中学生。

“老三届”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参加过红卫兵运动，其中又分为“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在“造反派红卫兵”中，又分为较为激进和保守的两大派（比如北京中学里势不两立的“四三派”和“四四派”）。“老三届”中的多数人在后来成了知青，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老红卫兵”也有上山下乡的，下乡后也是较早返城或离开的。本书页926的照片说明有误：北京对初中生上山下乡的大体安排是：66届去兵团，67届去插队，68届分工厂。其实66届也有不少去内蒙古和山西插队的，还有少数留京进工厂以及服务行业的，去“三线”企业的。68届进工厂和参军的较多，但也有不少人去了陕西延安地区插队。作者认为：70届的北京初中生最多也只会送到郊区农村插队（页985）。事实上，这一届的北京初中生几乎100%都进了北京的各类企事业单位工作。



作者指出：与“新三届”相比，“老三届”知青的中学学历较长，见识较多，自主能力也比较强。面对新环境也具有更多的思考判断能力。当兵团在知青中选拔人材时，他们更容易被看中。兵团的环境对“新三届”来说是社会课堂，而对“老三届”而言，则更多的带有社会舞台的意味。

在34.5万兵团知青中，老高中生们得到重用的机会，明显要比“老三届”初中生和“新三届”们更多。一个连队里如果只有几个老高中生，那就容易得到重用。如果扎堆，就不大好用了。这些人成熟度较高，不好调理，兵团的一些军人和基层领导的文化水平及见识常常都不如他们，如果让他们都充分人尽其才，整个连队弄不好就会成了这些人的“半壁江山”。所以基层连队不能给他们这种“翘辫子”发挥才能的机会。

同为“老三届”知青，其境遇、见识、思想深度和生活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的。“老三届”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之间，当然不仅仅在于年龄和知识水平的差别。当年在北京的中学，有不少高中学生到低年级的初中当辅导员，比如北京35中老高二的王岐山，就是初二任志强他们班的辅导员。作者引述了一位文革前就进了北大的学者的话：人是在高中阶段形成独立思维体系的，包括价值体系、学习方法和自我设计。高中是主动学习的阶段，自身塑造转为重点，学校教育变为辅助。这与智商无关，错过了这个最适当时机再补习，要想达到最好的效果就不容易了。“老三届”和“新三届”的初中生，尽管也有人后来读了大学，但与文革前就上了大学的一些人相比较，其思想深度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34.5万知青的到来，成就了北大荒垦区文化生活一段亮丽的辉煌和高潮，本书的第十三章《艺术的星空》对此做了生动细致地描绘。难能可贵的是，这种文化影响在8年的兵团时期，还逐渐渗入了下一代北大荒人的文化意识。

本书的第十四章《左右之间》，描述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普遍以所谓的“家庭出身”来划分人贵贱等级的社会现象，那些新中国的“贱民”在北大荒的一段悲惨遭遇。过度的政治化不仅制造了各种运动被整者的巨大贱民群体，还使其家庭受到深及心灵的政治株连。如家庭政治符号化：从家庭成员的纵向关系来看，家庭的阶级符号如地主、富农、

资本家、小业主，政治符号如国民党、三青团、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这都是党组织和政府分配政治资源、社会资源的基本依据。家庭出身被政治符号化，其对子女的影响就会被放大、固化。这些亲情悲剧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其范围之广、创痛之巨，为亘古未有。它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当代创伤性记忆的主题之一。

本书在第十五章《名誉与情欲》和其它各章节，描述了不少知青所受到的打击和迫害。

知青们是作为接受“再教育”的改造对象来到农村的，有些品质低下的建设兵团、农场和社队干部，就可以在法制被践踏的大环境下，对没有反抗能力的知青任意欺辱，摧残迫害。随意批斗捆绑知青的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各种残酷的毒打手段形形色色，无所不用其极。知青想得到非农业的工作岗位（会计、教师、卫生员、售货员等），必须要通过这些干部的安排。由于其户口、粮食关系都掌握在兵团、农场和社队干部手中，知青们想通过招工、招兵、入党、提干、上学的方式脱离农村，都需要经过这些干部的推荐和批准，这就难保没有潜规则了。因此，某些干部，特别是在知青比较集中且实行半军事化严格管理制度的兵团和国营农场的干部，对知青就享有了基本上难以监督制约的权力，甚至可以对知青为所欲为，如对女知青的性侵害。而在当时法制法规不健全的年代里，知青们却普遍缺乏有效保护自己的手段。

四）本书分析了黑龙江兵团连年亏损的原因，有总结历史教训的借鉴价值：

1、兵团前期存在的管理问题（页 350）：

①. 由于文革造成的恶果，生产指挥系统被打乱，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弛。

②. 主持兵团工作的各级现役军人对战备以外的所有社会管理职能都普遍生疏，且缺乏指导机械化农业大生产的能力。盲目照搬所谓“大寨”精神，违背农业生产规律的瞎指挥，不重视科学技术和机械化作业。

③. 接纳安置知青过多过猛，实行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

④. 取消职工的家庭副业，加剧了生活困境。1968年12月，黑龙江兵团决定：取消自

留地，由连队集体种菜供应；严格限制私人养猪，不准养母猪，仔猪由连队供应，养肥后统一收购交售国家。其它家庭副业如采集、养蜂、捕捞、编织等，也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除净尽。<sup>1</sup>

2、当时北大荒连年的自然灾害，东涝西旱，到1974年才有所好转，连续两年丰收后兵团被撤销（页342）。

3、兵团前期基建投入大。如修建公路、电力和通讯网线、盖房子等等，等到后期刚刚有了收益，兵团就被撤销了。

在黑龙江垦区的发展史上，兵团是一种特殊的管理体制和组织形式。双重任务要求兵团将大型国企与边防战备需求结合起来。军人的接管，要把属于政府职能的政法、基本建设、电力、道路交通、邮政通讯、文教卫生、商贸金融税收等各类部门进行统一管理。这就使兵团成为党政军合一，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大而全且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体系和半军事化组织（页351）。

实际上，用军队的方式来管理一个超大型国企，企业办社会，职能包罗万象。一般国企的弊端应有尽有，而且由于功能超全而更加严重。兵团甚至可以实施抓捕拘留的司法行为。这样的超大型国企，其经济效益低下似乎是难以避免的。

四）生产建设兵团的解体和兵团时期开发北大荒的农业生产得失：

随着边防战备任务被解除，经济现实原因迫使中央废除军垦农场制，恢复了国营农场制。生产建设兵团是在文革中匆匆成立的，因此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以及经济效益问题，包括文革前建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各地生产建设兵团历年大规模的垦荒和砍伐，对当地森林、草原植被及湿地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至今没有看到过全面详细的调查和统计数据。

北大荒当然是中国不可替代、不可多得的大粮仓，为我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种前苏联式的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并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三江平原因

<sup>1</sup>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4月，第298页。

而生态环境恶化，87亿吨地表水随之流失，湿地面积比建国初期减少了70%；对原始森林和植被的毁灭性破坏也是史无前例、骇人听闻的。兵团时期开发北大荒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付出的成本代价，是对子孙后代欠下了巨额债务。国务院已于2000年明令停止开发北大荒，黑龙江省在一些地区实施了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地沼泽）。

1971年，有1700万亩耕地的黑龙江兵团粮食总产量27亿斤，平均亩产160斤（页312）。这在当年广种薄收的北大荒还算是常见的。但按照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黄河以北的粮食亩产量是400斤，达500斤就过黄河了。1973年，有1750万亩耕地的黑龙江兵团粮食总产量9.3亿公斤，亩产约53斤（页343，疑为53公斤）；有800万亩耕地的黑龙江省属农场局粮食总产量2.6亿公斤，亩产约33斤（疑为33公斤）。因为一亩地种子就要50斤，再加上人力物力和油料等等的成本消耗，亏损是肯定的。

从1967到1969年，全国各兵团亏损额增加了近5倍，达到4.6亿元，而投资经济效益则下降了13%。1970年10月召开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寻求解决办法，但没有任何结果。从1971到1973年，生产持续下滑。黑龙江兵团连续5年累计亏损5.37亿元，年均亏损1.07亿元，仅在1973年就亏损了近2亿元。全国兵团系统的亏损更高达11.1亿元。<sup>1</sup>黑龙江兵团34.5万知青的探亲路费无从着落，结果是兵团后勤部跑到北京活动，拿到了燃料化学工业部领导康世恩的批件，将大庆油田每年盈利3000多万元的林源炼油厂无偿划拨给兵团，如此，平均每个知青每年可得100元的探亲路费，炼油厂成了兵团唾手可得的一块肥肉（页360）。

根据1973年2月总参谋部和农林部的调查报告，黑龙江兵团因搬用军队的组织形式，机关架构臃肿，比原农垦总局和农垦厅的编制增加了一倍。兵团机关设司、政、后三大部，共25个处，直接管生产的只有三个处59人，仅占机关总人数的8%；兵团和师级机关行政事业费开支，1971年为1100万元，另有460万元国防费开支未记入内。内地的各兵团并

<sup>1</sup>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第295-296页。

没有边防战备任务，也没有什么荒地要开垦，其存在的意义不大。<sup>1</sup> 在这种情形下，中央从1972年至1975年逐步撤销了全国的12个建设兵团，原先在兵团的知青就成了国营农场职工。最后撤销的黑龙江兵团虽然在其最后的两年实现了扭亏为盈，在交接时有了近亿元的盈余，但中央还是于1975年底决定予以撤销。

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江拥辉在1973年（应为1976年）10月9日向黑龙江省移交兵团管理权时的数字为：5年来开荒576万亩，耕地面积由1968年的1300万亩扩大到1900多万亩，增长了44%。兵团的粮食总产量由组建时的26.69亿斤，增加到38.78亿斤（页399）。兵团还给北大荒留下了一批化肥、水泥建材、农机、钢铁、煤炭、屠宰、制糖等各类企业。

北大荒在以往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今天中国的大粮仓，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

①. “统分结合”的双层管理体制。“六统”：作业标准、收费标准、核算方法、产品销售和农机停放实现统一；“一加强”：加强机械管理；三个“分”：土地承包到户、盈亏核算到户、费用垫付到户（页468）。

②. 以前的北大荒常常是在低洼易涝的地区种植旱田作物，不重视高价值水稻的生产。如今三江平原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水稻产区，有四千万亩稻田，平均亩产上千斤。黑龙江省的粮食年产量已达1500亿斤以上（页1012）。

## 二、有待商榷和讨论的问题

任何历史都不是对一切“过去”的简单摹写，也不是一系列过去人事的罗列或史料的随意堆砌。历史不可能是过去人类活动的全部内容，而只是其中被人们记忆和思考过、理解和诠释过的那一部分人类活动。历史中不仅有大量存在的事实，更有普遍存在的价值。事实是不变的，价值会随时代的进步和人类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扩展延伸。

作为一部东北兵团口述史大全，作者的宗旨是只陈述史实，不做明确的结论，以留待

<sup>1</sup>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第297页，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74-378页。

后人去评论。对一些问题有些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叙述者和作者也往往难免会有一些带某种倾向性的议论，其中的某些理论分析有时也不够深入。

1、上山下乡作为一场运动，是在全球走向国际化、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过程中的一场反历史进化方向的空前绝后的社会大迁徙。

作者在分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成因时，只谈了中共建政以来社会管理的两大特点，其一是经济政策的计划性，无法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其二是人口政策的非计划性导致人口增长过快（页39-41）。1968年，中国已积压了约1250万“老三届”中学生，其中家在城市的有400万人，<sup>1</sup>当然不可能短期内在经济状况下滑的城市里就业，他们只能分散到广阔天地去。

法国学者潘鸣啸提出：若是由于文革中无法解决就业问题，因而造成1968至1969年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那么，何以解释当年在校的“老五届”大学生，也全部被赶往军垦农场；何以解释知青大规模下乡后的第二年，大中小城市均开始大量招工？本书作者认为国家行为的“回收”下乡知青，始于1970年启动的高校招生（页942）。1970年代初，在我国经济生活又一次出现了工矿企业招工失控的现象。1970年和1971年国家计划招收306万职工，结果招了737万人（一说933万）。<sup>2</sup>1972年继续盲目招工，三年共增加职工1200万人，造成了“三个突破”（职工总数突破5000千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一个窟窿”（动用粮食库存100多亿斤）。<sup>3</sup>这三年上山下乡的人数逐年减少，大批知青（数目不详）也得以被招工回城。1968—1969年，全国有近500万知青下乡，1970年共有106.4万知青下乡，仅相当于1969年人数的39.8%；1971年减至74.83万人，1972年减至67.4万人。<sup>4</sup>这样算来，截至1972年，全国共有748.6万知青下乡，而1970—1972年共招工1200万人，完全可以把当时所有在农村的下乡知青都召回城市。

1972年2月，周恩来总理就此提出了批评：现在企业乱，要整顿。目前有些自流现象，

<sup>1</sup> 中国教育年鉴编委会：《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001页。

<sup>2</sup>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第101-102页。

<sup>3</sup> 《中国劳动经济史》，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284页。

<sup>4</sup> 《中国劳动经济史》，第167页。

原来的人不用，插队去了，又要招新的。职工增加太多，非犯错误不可。<sup>1</sup> 4月，国家计委因而发出“严格控制增加职工，充分挖掘现有劳动潜力”的通知，但未能贯彻执行。1973年2月，李先念副总理在全国计划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做了更严格的限制：除了特别批准以外，1973年和1974年基本不招工，甚至1975年也基本不招。<sup>2</sup> 但1975—1976年又出现了招工的强劲势头。约从1973年起，国家再度加强了对从农民中招工的限制，逐步扩大了知青在招工中的比例。<sup>3</sup> 1973年，“子女顶替”退休职工的政策恢复以后，也加快了知青们向城市的倒流。

据统计，在1966—1976年1700万知青下乡的十年间，有多达1300万的人从农村返流进入城市就业，其中知青约有450万人，农民850万人（包括原籍在农村的回乡知青和复转军人）。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乡劳动力大对流。<sup>4</sup> 另一个数字为：那十年间共有1400万人从农村进城工作，其中知青600万，农民800万人。<sup>5</sup>

对当时各企业大量招收农民进城做“临时工”的事情，政府有关部门、企业的干部职工、农村社队干部和农民本人都乐观其成。但政府部门对此是比较审慎的：尽量不要让历届下乡知青及其家长知道城市各企业在同时大量招收农民工，以免激怒他们而影响了一届又一届中学生的上山下乡运动。

潘鸣啸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知青大规模下乡运动，源起于政府高层的四种动机，又可分为三大类：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的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社会秩序并强化最高领袖的权威）；社会经济动机：一是积极的（发展农村和建设边疆），另一是消极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sup>6</sup>

一个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国家，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生绝不可能

<sup>1</sup> 《当代中国》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36页。

<sup>2</sup>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438页。

<sup>3</sup> 《北京劳动大事记》（1948—1990）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第185、188、211、213、216页。

<sup>4</sup>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第498页。

<sup>5</sup> 《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第138页。

<sup>6</sup> 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仅仅由单纯的经济因素决定。1968年以后，由经济困境造成的驱赶知青下乡自食其力的动机虽然继续存在，但下乡并不是唯一可以解决那些经济问题的途径。只有在某种基本由政治思想因素决定的发展逻辑内，才能解释这唯一途径的合理性。越来越多的史实揭示，有关“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口号，是施行愚民政策冠冕堂皇的借口，目的是防止在新一代中滋生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父亲”将儿女当做祭品，供奉在其权力意愿以及与现代世界背道而驰的意识形态祭坛上。<sup>1</sup>

以行政手段的迁徙而不是以发展经济来消灭失业，其客观效果是灾难性的。知青必须到贫穷落后的农村中去接受“再教育”，而不是留在城市里接受更先进的教育。这种恶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影响了一代人，直至波及到其子女后代。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工人运动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只可能走向工联主义。必须由先进知识分子从外部进行灌输，工人阶级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也明确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sup>2</sup> 必须不断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sup>3</sup> 因此，主张由工人农民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理论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且有反智的民粹主义性质。

文革开始两年后，教育与生产部门都处于瘫痪状态。由于中学停课、大学不招生，企业基本不招工，数百万处于青春期的政治分裂状态下的中学生们也就日益成为城市里的一个不安定因素，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更有一些红卫兵组织不忠实执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依旧闹派性、搞武斗、制造事端。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之后，解散红卫兵组织以恢复秩序便被提上了日程。

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带着一种强制动员性的政治涵义，是一条促进青年革命化、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光辉道路；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

<sup>1</sup> 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420，431页。

<sup>2</sup>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1366页。

<sup>3</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44-245页。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简称“三大差别”），“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2、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的思想基础也有着多重因素：17年的教育；宣传方面的渲染甚至欺骗；强制性的政治动员效果。三者相辅相成，并非截然对立。

1700万城市知青中，有多少是自觉自愿甚至写了血书去下乡的？特别是在“老三届”（66—68届）和“新三届”（69—71届）之后下乡的中学生们。

自愿报名要下乡的场景，不仅仅是在表面所呈现的革命热情，也有部分人害怕自己在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沦为异类的心理因素。那是从童年到少年再进入青年都唯恐被抛弃的感觉。知青从小就有集体的归属感，那种与家庭的纽带和自我的需要，早已被集体感所融化。那种不安全感已深入心灵。一种对权势的恐惧，对社会的情感脱离，也已经悄然进入了人们的骨髓。某些知青题材的作品似乎让我们感受到了自己曾经的英雄气概，让我们感到自己还是有价值。知青过去是幼稚的羔羊，没有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而如今我们不再需要用某种浅薄的东西来做什么心灵安慰剂。

上山下乡是一场充满革命幻想的乌托邦运动，知青下乡前往往被刻意渲染过的乡村田园景象所吸引，以为乡村充满玫瑰色的浪漫情调。当年动员城市知青下乡时的宣传描绘也令人憧憬：北大荒处于大小兴安岭以南的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以及从完达山到兴凯湖的牡丹江平原。春天冰雪消融，绿草如茵，鲜花遍地；盛夏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山林草地千里一碧；秋临霜染枫林，万山红遍，彩霞落照，一片金辉；冬季极目所见，一片银装素裹，大地幽静和谐。

然而，文革中大批知青走向农村的思想基础与建国后17年的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忠诚和盲从教育亦不无关联，这一代人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单单靠一系列的强制性手段，恐怕是难以创造出这种奇迹的。如办学习班，吊销城市户口，停发粮票，户籍警察和街道居委会轮番上门劝说和威逼，由家长的工作单位出面施加压力，以对其家长停职、停发工资相威胁等等。除了一些先锋者，很多城市中学

生也有过犹豫，不情愿，有过不甘心，想不通和无奈，但他们还是上路了。也有些孩子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和摆脱城里令人厌倦或困窘压抑的环境而离家的。下乡的原因和动机不同的知青以及而后生活经历，对那段曾经的艰难岁月，自然就会怀有不同的心态。

有哪些作品描述过这一系列的欺骗和强制性动员手段与大多数城市中学校生当时的真实心态？尤其是在1968年底毛泽东一声令下之后，强制性的政治动员就逐渐压倒了原先的自愿原则。在不断拔高的宣传调门中，上山下乡运动被涂上了一层又一层神圣的迷彩。对上山下乡的态度，被说成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被当作判断一个青年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基本标准。当年最普遍的口号就是“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才有出路和前途”，要在“大风大浪”中实现“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这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群体意识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知青们在文革前所受的教育让他们鄙视怠惰、软弱、享受和“骄娇”二气，使他们能够注意磨练自己勤奋努力和吃苦耐劳的品质。

3、当时的中国是否存在腐败现象？（页221）在大饥荒年代，为了保证各级干部的身体健康，由刘少奇主席下令，将高级干部的“特供”待遇延伸扩大到17级以上的中层干部，一般普通的老百姓就只能是心生羡慕而望尘莫及了。同时，各单位还按照上级的部署，举办了形形色色的干部“培训班”，借此给基层干部改善伙食、增加营养。等脸色好转，健康状况改善之后，再轮换一批。当年在北京朝外东大桥中纺部东郊宿舍六区（东院）第一排，原纺织工业部干部学校就有一家这样的招待所食堂。我曾多次在路过时溜进门洞，吞咽着口水，看着食堂小黑板上丰富诱人的菜肴名称，垂涎欲滴。虽然吃不到，但我还是经不住诱惑溜进去，看着那些红光满面的人们享用种种美味佳肴。

对文革前及文革中当年并不鲜见的腐败现象，多年前张贤亮、徐友渔等许多人都有过具体的描述。不论在哪个时代，对权力监督制约的机制不健全，都必然会产生腐败。

当年的知青们想得到非农业工作岗位或入党提干，回城就业或就学，都要经过基层干部的推荐和同意。如前所述，在1700万知青下乡的十年间，有600万知青和800万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首先，有权批准知青和农民进城工作的农村各级干部，因而就有机会得到物质利益和好处。其次，进城务工的农民要想继续留在城市里工作或由临时工转正，也免不

了要对企业的干部行贿。

那十年间有600万知青通过“三招”（招工、招兵、招生）和“两退”（病退、困退）的方式回到了城市。出现了大量干部子女“走后门”回城或当兵、上大学的事例（页946-950）。与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并行的是“走后门”之风的悄然兴起和畅行。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工农划等号”、“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等口号的辉映下，是政治特权的高扬。同为知青，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方面没有公平竞争机缘。再加之封建“血统论”的肆虐，对众多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多数“三招”无望，“走后门”无路，没有机会离开农村的知青们，就想方设法利用“病退、困退”的方式回城。建设兵团的知青属于全民所有制职工，在人员流动上受到比插队知青更严格的限制，“两退”就成为其返城的重要途径。久而久之，假冒现象愈演愈烈。各地知青假冒重病的骗术无奇不有，其目的均在于获得一纸医院证明。有许多手段都是以残害身体为代价的（第十七章《潮落》和其它章节中的描述）。

大约从1971年开始，为了通过“两退”的手段回城，建设兵团、农场、乡村各级干部，医生，街道办事处及居委会，有关单位的人事部门就成了知青及其家长的“公关”目标，新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关热”悄然兴起，并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许多已在当地就业和上学的知青，也纷纷要求辞职、退学，回农村恢复知青身份，以期回到父母身边。

作者认为：文革时期经济停滞、物质匮乏，社会不具备掌权者被金钱击垮的客观条件。由于当年普遍的贫穷，行贿当然不可能是巨额钱财，比较流行的是“20响”（一盒香烟20支）和“手榴弹”（白酒）。由于知青们送来的往往是两瓶香油，有一个生产队书记的家里，居然积攒了一小缸香油！给医生、街道办事处及居委会，有关单位的领导及人事干部送的礼物，也常常是以土特产为主。后来随着水涨船高，就逐渐升格为被面、羊毛毯，手表、收音机和人民币了。到九十年代初知青们办“假接受”回城之时，送礼就常常是金项链、戒指和现金了。这一切，所有过来人都是一清二楚的。不论在哪个时代，对权力监督制约的机制不健全，都必然会产生腐败。判断腐败严重的程度，主要不是看权钱交易的绝对“交

易额”如何，而是要看社会普遍的物质生活状况与受贿金额、与权钱交易的“交易额”的比例。有人描绘：文革期间的腐败官员，就像闯入贫困之家的强盗，而今日的腐败官员，闯入的则是富豪之宅。1979年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文革期间的腐败现象，堪称触目惊心。同样是1979年问世的高晓声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也让人看到文革期间的官员是怎样对百姓巧取豪夺的。

4、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处于半军事化生活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之中，劳动强度高，纪律严格，没有随意休息和不出工的自由，更不准随便回家探亲或逾期不归，令许多知青难以忍受。处于文革中的兵团政治气氛沉闷，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任务当仁不让地落在文化素质偏低、出身于贫下中农的现役军人、复转军人和老职工身上。一整套“左”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军队政治工作经验，以军事化的组织系统为依托得以大范围推广，保证了“再教育”工作的持久开展。而广大乡村的“再教育”大多虚应故事。插队知青尽管生活拮据难以自理，但生活环境相对宽松。乡村中的社会关系普遍松散，社队三级都缺乏强有力的干预机制，对知青无从控制，管理松懈，大多放任自流。知青是否参加劳动，劳动多少，回家探亲的次数及时间的长短，都主要取决于自己。乡村干部根本就管不着，也懒得管。大多数当地的农民和乡村干部，既不情愿也不具备教育和管理城市知青的能力。

与国家现代化机遇和人才的丧失相比较，知青们对农村的贡献实在是得不偿失的。一代青年给农村带去了城市文明，比如对农村孩子的教育和影响，改良农作物品种、推行农业技术、使用农业机械等等，少数知青在农村的有所作为，是以大多数知青的无所作为为代价的；其次，以剥夺知青受教育的权利为代价所取得的一点成果，显然也是得不偿失的；再者，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否定与对知青贡献的肯定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一代青年确实经受了锻炼，但其付出的青春代价和成本是无法补偿的。

苦难有可能转化成人的精神财富，但它并不天然地就是财富。有些因靠其天赋、背景、关系、机遇和自身的努力，而走过了苦难的所谓“成功者”，惯常把自己过去的卑微经历说成是今天荣耀的资本，以炫耀其劫后的辉煌。于是，一种某一部分人所拥有的、有时甚至

是虚构的集体意识，就代替了每个个体的亲身经历和独特经验。有人说知青的苦难是一笔财富，历史以数千万人20年的青春血汗为代价，磨练出这一代人的意志品质。我们这代人的奋斗精神，来源于从小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和培养，下乡的生活经历曾直接形成了迫切改变生存环境的巨大压力，但这并非是我们努力拼搏的唯一动力。

1962—1976年，下乡青年中有82.56万人进入了大学、中专、技校。<sup>1</sup>1977—1979年，又有43.9万知青（不包括当过知青的工人、干部和军人）通过高考进了大学。<sup>2</sup>而文革中仅仅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就是1700万，还不包括人数加倍的返乡知识青年！如此高额的成本代价，这不是一种悲剧筛选吗？如果因为这其中出了为数不多的官员、学者、作家、艺术家，就将此归因于苦难的培养而去美化和赞颂苦难，这不是一种理性的反思。这种苦难是对青春的浪费和吞食；是对人权的践踏和对人性的摧残；是不合理的、非正常环境下的产物。

知青生涯中最大的痛苦来自精神层面。

知青作家张抗抗在对《失落的一代》的书评里写道：“以革命的名义所推行的强大思想操控、使个体在集体意志下彻底丧失自我，是知青一生中最恐怖的记忆，那是比付出荒废学业、奉献青春、牺牲个人前途的惨重代价更为巨大的精神损失。”

我们应该从群体的基本状况，理性地去看待知青在这场运动中的真正苦难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能无视历史的背景和千万个孩子被高层和集体的意志奴役了20年的实际状况！更不能违背残酷的客观事实，抹杀应尊重人权、人性的前提。知青的苦难并非来自于我们自身的脆弱，而是超出我们权利范围的国家强加给我们的。只有这样的反思和内省，才能起到对今天社会的补救和医治作用。试图以集体主义精神，以所谓的人性温暖，以做我们曾经那样的好人，是十分可笑的。想以此来缓解一些人的某种消沉心理，实际上却是在延缓和阻碍知识和思想的进步。

<sup>1</sup>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第302页。

<sup>2</sup> 张曙：《邓小平与知青问题的解决》《党的文献》2003年第6期。

我们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金钱至上，权力腐败，诚信缺失等等现象，实际上就是在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中播下的恶果。某些知青题材的电视剧让年轻的一代对剧中兄弟姐妹般的知青友谊产生了一种向往，苦难都冲淡在那些浓浓的所谓与“农民的抱团温暖中。”并且把专制对人权人性的践踏，对青春的摧残和毁灭归结为个人的不幸，而没有明确指出社会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倒退。知青的苦难在4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除了个人的自我发展受阻，还导致了生存状态和竞争的不公平性，引发了正直品质和个人道德水平的普遍下降，尤其是对法律的藐视，人人自危而不敢说真话。

比恶劣的生活条件及生产环境更可怕的，还有知青同类之间的倾轧、明争暗斗与欺压。定宜庄教授在《中国知青史》一书中对此也有过分析，从文革到上山下乡，这代人的各种表现已经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本性中同样存在着自私、贪欲、卑鄙、冷酷等恶的一面，在理想主义下，亦有一己而出人头地的私欲；草菅他人之命的行为，掩盖着某种出卖别人保全自己的丑恶。人的欲念和追求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不能正视，还是明明知道却设法掩饰，它还是要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旦这种欲望通过正常的渠道无法伸张的时候，它就要以扭曲的、不正常的、甚至不正当的方式发泄出来，由此就出现了自觉或不自觉的虚伪。有的人还会以要求进步、靠拢组织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别人的小报告，一些恶劣者还会以此来揭发、举报和诬陷他人。

法国学者潘鸣啸在《失落的一代》一书中的相关论述，不仅揭示了发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领导人公开或隐蔽的动机，同时也展现了由此在整个社会上引致的严重后果。他以大量亲自采访的知青事例，论证了文革十年导致的伪善犬儒主义，人与人之间盛行的告密、行贿、虚假行为，败坏了社会风气，催生了新的利益阶层。

##### 5、知青在乡村里走出盲从和狂热的起步

知青在下乡以前所接受的是社会主义“尽善尽美”的教育，教育者始终没有将社会落后和阴暗的另一面如实披露。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封闭、肮脏和愚昧，对知青们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这样一场长达20年，涉及到数千万知青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带着一种

浓厚的民粹主义反智倾向。一些知青到农村后才了解到土地改革、集体化，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及而后推行“三自一包”措施的真实情况，看到农村体制的弊端以及那一套极“左”做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在继续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和大量“禁书”的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文革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和探索，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调查，从而成为那一代人思想上的先驱者。建国17年教育使这一代人最缺少的怀疑批判和独立思考的精神由此而产生，其中有不少人成了后来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

作家张抗抗在对法国学者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一书的评述中指出，中国知青下乡运动提供的独特历史经验，为魅力威权的局限性做出了极好的诠释。而历史的吊诡与反讽在于，恰恰是上山下乡运动，促使知青开始自觉思考自身与国家的命运。正如书中引述的学者李银河的一段话：理想主义造就了我们的现实主义，教条主义造就了我们的自由思想，愚民政策造就了我们的独立思考。<sup>1</sup> 本书第十七章《潮落》中所介绍的“黄刘之争”，知青黄一丁的怀疑精神，就属于突破“左”的思想束缚，走向客观务实的案例。黄一丁在恢复高考后得以上了大学。一些知青劳动之余在艰苦环境下坚持读书学习，这给他们后来的生活带来了积极深刻的影响。可惜未看到对那些坚持读书知青群体的专题描述。

潘鸣啸指出，就像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事件那样，失败本身会带来正面的后果，这场运动也不例外。它提出的众多重大问题迫使毛的继承者进行改革。毛泽东的激进与极端政策，在各个领域里都加速了历史的进程，不过是朝着毛所期望的相反方向进行的。<sup>2</sup> 在这方面最高领袖失败了，他想要改造这一代人，结果却造成了一批实事求是、注重法治、人道的人，而不是他所期望的革命接班人。

知青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最艰难的时期，他们是与共和国患难与共、一起成长的。在长身体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人祸大于天灾的“三年困难时期”，懂得了什么是饥饿；在应该

<sup>1</sup> 李银河：《我的人生第一课》，《北京文学》1998年第6期，第102-103页。

<sup>2</sup> 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418页。

受教育的时候，却被送去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落下了一身的伤痛；艰苦的环境，各种意外事故的侵袭，有病得不到及时医治，使一些青年英年早逝（第十六章《青春的墓碑》中的描述）。还有一些人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由于中断了学业，在农村也无书可读，原本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反而走向了退化。琐碎、平淡、无聊的乡村生活，日复一日地消磨着知青们的锐气、热情和抱负。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虽不愿意承受，却又不得不承受，历史注定了让他们这样度过这段岁月。

返城之后，能够成为所谓“社会精英”的人毕竟是少数。由于年龄偏大、又缺少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很多老知青只能从事较低层次的工作；当国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知青这一代人在下岗浪潮中首当其冲，并且普遍不具备再就业的能力（第十八章《找回岁月》中的描述）。政策失误和改革的某些成本就落在了这样的一个弱势群体身上，他们为国家和社会所付出的牺牲是很难予以补偿的。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他们步入中年之时，生活突然发生的巨变，却又一次让他们难以接受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适、冷落甚至遗忘。许许多多新的机遇，似乎都不是为他们所提供。面对新的生活方式，其年龄及业已形成的观念、知识结构，已经不可能允许他们做出理想的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金大陆：《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一书的封面上，用了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这一代人在现实面前的无奈：“对这些人来说，不可能理解，不可能选择，不可能超越的东西太多了。反过来，历史又要他们用命运去承负过重的责任。”这的确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上山下乡运动曾震撼了中国城市中的多数家庭，涉及到无数偏僻穷困的村庄，并且一直触及到一代青年的灵魂深处，它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共和国的一代青年在这场运动中销蚀了自己无价的青春。■



【述 往】

## 除夕悲雪

——孙阳武与诸排长

郭小林

我第一次见到孙阳武是在1965年春天，我刚被分配到园艺排男工班。

第一天出工，全班在路口会齐，已经到了几个人，就见远处走来一个人，黑棉袄黑棉裤，缩着脖子、两手揣在袖筒里，黑色破狗皮帽子的两个帽耳朵上下呼扇着，一窜一蹦地像个球似的就过来了，嘴里还荒腔走板地哼唱着：“姓张姓李不姓王，姓儿也比那姓孙的强……”

我那年刚满十八岁，孙阳武则年近四十。他老家是河南范县，因是黄河故道、黄泛区，十分贫穷，1959年北大荒农垦部门到内地农村招募农工，他带着老婆和三个孩子举家迁徙来到了种畜站。

老孙中等身材，脸色黝黑、上面布满皱纹，看上去倒像五十开外的人，不过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个挺滑稽的、自得其乐的人。

给果树打药的时候，我们男工班负责挑药。骄阳似火，暑气如蒸，挑着满满两个木桶的波尔多液，可比一挑水重不少，一天下来要走几十里路，男工们都脱了个光膀子，满脸通红、浑身油汗，我们几个知青，把上衣团成一团，垫在肩上，仍然疼得龇牙咧嘴。几天工夫肩部就红肿溃烂了……

而那几个老职工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样子，尤其是老孙，一挑重担在他肩上仿佛没有分量，不仅左肩右肩随意调换，一颠一颤地，嘴里还哼着小曲。令人惊异的是，他还要开了活宝——他低下脑袋，让一副挑子以他的后脖颈子为轴心旋转360度！工间休息时我凑近观察，发现了他的秘密：原来他的后脖颈子上长了鸡蛋大的一个肉垫，显然是长年累月

挑重担子的结果。

我好奇地摸了摸，软乎乎地并不硬，上面也没有老茧，只是表皮有点粗糙。老孙拨开我的手用一口范县口音说：“男人头、女人腰，不能摸！”“摸”在这里发“柳”（第四声）音。

冬天果园没活干，我们男工班被派到完达山里去伐木，齐膝的积雪中我们要把伐倒的木头截开（叫造材），四人一组用两副搭钩把木材抬到楞场，然后装车运回种畜站。

老孙又有稀罕令大家开眼——北大荒的冬天零下四十度，别人穿着棉胶鞋、裹着绑腿，鞋里还包着包脚布或者垫着乌拉草还觉冻脚，从积雪里拔出腿来鞋上沾的都是雪。而老孙到了歇脚的时候，解开鞋带，把脚丫子从棉胶鞋里抽出来，就好像是刚出屉的热馒头一样，冒着一大团热气！原来他是汗脚，而且特别不怕冷，所以从来不穿袜子、光脚穿棉胶鞋。不光是汗脚，他的手也是如此，摘下棉手套，两手两团白气。

这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虽然他那年还不到五十岁，却已有两儿一女，大儿子比我小不了几岁。

想不到，这样一个笑面弥勒，也有苦恼。

事情还得从文革前说起。

我们这个千亩果园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由一个雄心勃勃的、东北农学院园艺专业毕业的老大学生创办的。可惜种畜站地区的小气候条件较差，老大学生遂另选新址建了新果园。老果园就由种畜站园艺排维持着，老大学生走前，推荐了一个他从宝清农村招募来的果农担任排长兼技术员。此人姓诸，三十多岁，懂得些在高寒地区种植果树的经验。

其实，矛盾一开始都是很小的：本来诸某和老孙都是一个班里的农工，诸某为人圆滑，干活却不行（客观原因是身体单薄），很会讨老大学生的喜欢。老孙和班里的男工都是山东人（范县原属山东），都是直肠子人，有啥说啥，他们评价人的标准很简单，就看干活好坏。我虽然在全连二百多知青中比较孤立，但老职工对我还不错，就是因为我干活卖力气、不怕苦。

所以，由河南范县老乡为主体的园艺排的男工们就有些瞧不起诸某。老大学生一走，诸某竟一下子成为排长了，昔日时常被男工们挤兑的人突然成了顶头上司，大家就有点不自在。诸某想的是“可该出口腌臢气”了！要让全排人看得起，就得立威！他选定的目标就是老孙。

那年月，正是越来越讲阶级斗争、讲出身的时代，老孙恰恰有个短板：他出身上中农。按说，上中农还是属于劳动者，只不过自己辛苦一辈子攒了点儿钱买了点儿地。但整个社会充斥着极左的戾气，越左越革命！吃香的是贫下中农，所以别说地主富农，就连上中农也都给踹到剥削阶级堆儿里去了。

男工班里也有出身不好的，但都特别胆小怕事，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迈一步路。老孙则有一个“毛病”：好说，话多。

有一天晚上照例开会学习，在昏暗的灯光和满屋子自卷“大炮”的烟雾里，听有文化的年轻农工读报。劳累一天的人们，大部分都昏昏欲睡，也有的在交头接耳；诸排长站在那里，突然提高了声调说：“都精神着点儿，别开小会！”接着话题一转，面向着孙阳武坐的方向说：“孙阳武！你不好好学习，还在那儿骂我，别以为我听不见！”孙阳武吓了一跳，他确实跟旁边的人嘀咕着什么，但并没有骂诸某。他赶紧辩解说：“谁骂你来？我骂你啥啦？”

诸排长声色俱厉地说：“你没骂？我明明听见你说：‘别听他妈的胡咧咧！’”不等孙阳武反应过来，他就指着孙旁边的人说：“滕××！你说！他是不是骂我了！”滕××平常最“怂”的一个人，唯唯诺诺，谁也不敢得罪，这下子排里最大的“官”生气了，吓得他话都不会说了，只是口吃地说：“我没、没……没听清楚……”

诸排长大声说：“孙阳武！你这是对学习的态度问题！是对突出政治的态度问题！你要好好检讨！这不是对我个人的事儿，如果态度不端正，我要向站里汇报！”

一句话的事，两个人结下了“梁子”。诸排长觉得，只要你孙阳武向我低个头，认个错，这事就算完了，否则，看我怎么收拾你！孙阳武则认为，我没有骂你，凭什么栽赃到我身

上？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诸排长的步骤是，先要孙在班里检讨，他亲自到男工班来听，然后要孙在全排做检讨，实际上是要当众羞辱孙一番。没想到的是，孙始终喊冤，说自己根本没有在跟别人小声骂诸排长，拒绝做检讨。

不久，文革就到来了。

诸排长依仗着自己出身好（贫下中农），成了种畜站革命领导小组的一员。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将孙阳武的事儿上纲为“阶级报复”：出身上中农的孙阳武打击出身贫下中农的诸排长，“罪行”等同于反革命！而且与“炮轰派黑干将”郭小林划不清界限，罪加一等，于是由“群众专政指挥部”派武装民兵把孙阳武也抓到托儿所里关了起来。

一辈子“土坷垃里刨食”的劳动者，文革一来，居然也成了坏人。

孙阳武不知道应该向谁求助、向哪里喊冤？他见过的最大的官就是站长，可站里的领导跟他一样关在托儿所里。出身不好的、当过国民党兵的、抓了十几个。他觉得天塌了，真是“投诉无门”了。所以，他每天蜷缩成一团呆坐在木地板上，用粗糙的手掌抹着眼角不断涌出的泪……

然而灾难并没有完结——外来的打击不算，家里又“变生肘腋”了。

孙阳武的老婆姓张，虽说和孙阳武生了两男一女，可从来对这个家、对孙阳武没有满意过。一点儿芝麻绿豆的事儿，就能跑到家门口捶胸顿足、口沫四溅地大骂，什么“日你亲娘祖奶奶！”“你个狗逼操的！”骂上几十分钟不嫌累，本来就很丑陋的脸歪扭得愈发像个凶神恶煞。原因很简单，就是她的出身好，嫁给老孙这个“上中农”，本想着过上富裕日子，没想到仍然穷得叮当响；加上因他的出身受连累，觉得吃了大亏，更加气不打一处来！每天摔盆打碗，弄得家里鸡飞狗跳。

大概是在1966年夏秋之交，下午五点多钟，站里的高音喇叭突然发出急促的声音：“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孙阳武家的闺女走丢了！孙阳武家的闺女走丢了！全连同志能出来的

都去帮忙寻找！”连续播了好几遍，大家一听，人丢了，这不是小事！种畜站四面是庄稼地，庄稼地外面就是山野莽林，平常极少有人进去，夜晚总有狼的嚎叫声。这些年老虎是见不着了，但黑瞎子、野猪还是一到秋收时节，就下山祸害庄稼……

眼看太阳就快落山了，北大荒天黑得早，而且听说这姑娘上午就出了门，到现在不见踪影——人们一遇风险容易往坏处猜想：会不会……如果……万一……越想越觉得可怕，纷纷拿着镰刀什么的，分路向离住地较近的北边、东边林子搜索而去。

正当人们搜寻了近一个钟头工夫，高音喇叭广播说：“同志们回来吧！同志们回来吧！孙阳武的闺女找到啦！孙阳武的闺女找到啦！”

原来孙阳武的十二岁闺女孙兆芬，跟她妈妈赌气，躲进自家的豆秸垛里藏起来，想吓唬吓唬她妈，上午躲进去，中午饭也不出来吃，一直藏到下午天擦黑。孙阳武老婆着了急，跑到站里的广播室，要求广播找人。孙兆芬在豆秸垛里听得一清二楚，觉得事情闹大了，憋了一会儿就讪不搭地自己走出来了。

为什么赌气呢？这天一早，她妈妈给她一块钱，让她去五里地之外的四营商店买块肥皂；姑娘十二了，知道爱美了，从小到大没穿过袜子，就想着给自己买一双漂亮的花袜子，正好一块钱买了袜子还剩五分钱，就买了几块糖，含在嘴里那叫一个甜！

没想到九点多钟回到家里，劈头盖脸就遭到张老婆子一顿臭骂：“你个小逼崽子！知道臭美啦！我揍死你！”一边骂一边抡着笤帚追着姑娘打，孙兆芬也有点儿犟，一边跑一边说：“你打吧！你打吧！我走得远远的，永远不回这个家！”就跑远了，待到听不见老婆子的叫骂声了，才悄悄蹿回来钻进豆秸垛里藏了起来——北大荒家家都有豆秸垛，跟房子一样高，是公家分配给老职工的烧柴，每次生火去掏上几把，掏来掏去就掏出一个大洞，里面藏个人，把洞口用豆秸堵上，外面根本看不出来。

到了1968年，兵团成立，按照部队的建制逐级建立班、排、连、营乃至团；革命领导小组、群众专政指挥部就寿终正寝了。关在托儿所里的那些“犯人”也陆续放出来了，“罪名”也黑不提白不提地过去了。孙阳武坚决不肯再回园艺排，站里就安排他到食堂做豆腐。

北大荒三大作物：小麦、大豆、玉米；大豆个大粒圆，黄澄澄的，做出豆腐来，堪称天下第一！我去过老孙的豆腐坊，两个巨大的灶台上两口三尺半大锅整天沸腾着，屋里蒸汽氤氲，对面看不见人，待上片刻就热出一身汗。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老孙家又出了一件事。这件事是我的老班长给我讲的。

那是个冬天，老班长带队上山打石头，冰天雪地，寒风呼号，路过团部汽车站时，看见一个衣着单薄的老人蹲在路边哭，仔细一看，这不是咱们站老孙他爹吗？

一再追问之下，老爹擦干眼泪说：说出来丢人哪！我一个老辈儿，让自己的儿媳妇赶出门啦！丢人哪！

老孙的父亲那年一把年纪了，从范县千里迢迢坐了好几天的慢车（坐不起快车），到北大荒来看儿子，万万想不到的是，到了家门口，儿媳妇不让进门，她凶歹歹地说：俺们没你这个爹！你个上中农给俺家造了多少孽呀！要不是你这出身，俺家能遭这么大罪吗？你走吧，俺家没你的地儿！

孙阳武可怜兮兮地想替父亲争一下：老人大老远来了，你总不能水不让喝一口、饭不让吃一碗吧？

“我一个贫下中农，我就是不让你这些坏人进门！你再闹！我他娘的连你一块赶出去！”

咋办呢？一天就一班长途车，今天晚了，想走都走不了，万般无奈，老孙只好找到知青宿舍，看有谁去探亲，空出铺位，让老爹凑合一宿。吃饭，只好去食堂打点儿剩饭，捅开豆腐坊封着的灶，给老爹热了热、又弄了碗热豆浆，算是把肚子填饱。

第二天，老爷儿俩赶了十几里路，老孙偷偷地把老爹送到了团部汽车站，爷俩相顾无言、洒泪而别——他还得赶紧回去做豆腐！

儿子走后，老爹一个人在车站越想越窝火、越想越难过，本来他这回来看儿子还真是有了难处：家乡搞农业学大寨，生产越搞越糟，吃不饱饭，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十分，仅值九分七厘钱，他想再怎么说明，北大荒是大粮仓，儿子没钱，但弄回一袋白面应该不是太难

吧。没想到，两手空空就被赶出来了——也不能说两手空空，还“挣”了一堆臭骂呢！这让他回去怎么向眼巴巴盼着白面的亲友交代！

于是就有了老班长他们看见的那一幕。

从此再也见不到孙阳武的笑脸，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他整日埋头在豆腐坊里，只管磨豆浆、做豆腐；包裹着他的是豆腐坊那团团的蒸气，更是他对诸排长的怨恨——也别责怪他心窄、见识浅，他认准一切灾难都是因为诸排长而降临到他身上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因为长期郁闷，基层也不具备什么医疗条件，五十出头的他竟得了一种怪病（其实就是现在常见的脑溢血），先是偏瘫，继而半身不遂，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本应对他尽妻子照顾之责的张老婆子，更加嫌弃他了，对他变本加厉地虐待，除了惯常的恶声恶气的呵斥、詈骂，到后来发展到不让老孙上炕，只许他躺在地上一块破席子上，吃饭也是给丢些剩饭在一个肮脏的破碗里，那状况竟是猪狗不如了，种种惨状，实在不忍详述……

苟延残喘的孙阳武，已经没有保护自己的 ability 了，他唯一想的是死。但怎样死法呢？饿死渴死然后像块臭肉似的让人扔了？心有不甘啊！

大约在1979年新年过后，孙阳武瘫痪已近半年。在将近春节即年关的时候，他暗自下了决心，要采取一个特别的死法，要让大家知道他心中的不平、表达他最后的抗争！

他暗中作着准备：趁张老婆子不在的时候，他靠着还能活动的两只胳膊，爬到小屋，翻找到需要用的东西和棉衣棉裤，藏在他够得到的地方；那几天里，他尽可能地强迫自己多吃一点儿哪怕馊饭烂菜，以使虚弱的身体恢复一点儿体力。当然这一切都做得不动声色，不能让张老婆子有丝毫觉察……

除夕前两天，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北大荒冬季的暴风雪是出了名的，当地俗称“大烟泡”，狂风挟着暴雪，呼啸千里，暗无天日、对面不见人。即使不刮风，厚达一米的积雪也令人裹足难行。

那两天的大雪，直到年关才有了减弱的迹象。家家户户备齐了年货，早早躲进低矮而温暖的屋子里“猫冬”去了。窗外的劈柴垛上冻着一筐箩一筐箩的饺子，大年夜全家人围坐在炕桌旁，热气腾腾地吃着饺子、就着酸菜炖白肉、喝着北大荒白酒，该是多么红火热闹啊！

老孙家里却是另外一种景象：冷冷清清，肮脏凌乱，臭味熏人……

大儿子复员回来安排在宝清县邮局工作，找了个县小学的老师，挺周正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不料张老婆子死活看不上这个媳妇，整天指鸡骂狗、横挑鼻子竖挑眼，生生给骂跑了。儿子受此刺激，渐渐精神不太正常，在宝清待着不肯回家。二儿子在这样一个家庭，刚二十出头就得了癌症，去年去世。那个孙兆芬，对这个家早就厌恶透了，刚满十八岁就嫁到二营（分场）去了。

张老婆子怨天怨地，怨自己命苦，嫁到这样的人家，丈夫不好、儿子孬、媳妇坏、闺女不听话……就是不怨自己。对着瘫在地上的老孙，依然是无休止地捶床捣枕地骂，祖宗八代地诅咒……

好不容易捱到半夜，雪静悄悄地停了。俗话说：下雪不寒雪后寒，后半夜的气温骤降到了零下三十多度。

孙阳武家那恶妇累了困了，睡死过去。睡死过去的还有整个种畜站住区，因为没有路灯，而午夜过后，所有的窗户都是黑的，只有缓缓的北风在无人区般的住区里穿行。

孙阳武也毫无倦意，他竖着耳朵，一直等到张老婆子鼾声响起，才轻轻拨开里屋的门，先爬到北屋摸出准备好的东西，又艰难而缓慢地套上破棉裤、穿上破棉衣，戴上破皮帽子，便“上路”了——像一条虫子似地慢慢爬了出去。不过虫子是一拱一拱地爬，而他的下半身无法动弹，只能凭着两只胳膊匍匐着、拖着整个身躯向前蠕动。

一出家门，他便一下子掉进半米厚的新雪里，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瞬间侵彻了他的周身。他早已不复是当年打药、伐木时的壮劳力，而是瘫痪半年、气息奄奄、极度虚弱的垂死之人，每爬一寸都要拼出浑身力气，都觉得喘不过气来，他拼命张大着嘴，任凭白雪涌



入口中、灌进衣领……

风渐渐停了，乌云未散，天黑如墨，站立行走的人都只能凭借白雪反射的微光辨认道路，何况老孙的脸几乎贴在路面上，路面上的积雪比他的头部高出一倍，使他无法看到周围任何景物。但这并不能难倒他，在瘫痪的日日夜夜里，他不知多少次地默习过他家到那个仇人家的路线——他家离仇家的距离并不远，也就隔着几排房子，至多不过两百米罢，“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到那个人的家门！”他想。

短短的路程，他不知爬了多久，他艰难地抬起头，依稀看见自己已爬到路口拐弯处了，这就意味着离那个人家不远了！他鼓足最后的勇气，用冻僵的双手拖着冻僵的身子，爬啊爬啊……近了！近了！隐约中仿佛看见了仇家的房子（实际上黑乎乎的是看不见的）。

也许是冰雪冻得一激灵，他突然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件事：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我咋没想到呢！”——

原来，孙阳武的计划是：春节前的除夕之夜，要吊死在诸排长的大门上！为此他筹划了很久，他偷偷藏起了一根结实的、长度足够的麻绳；现在这麻绳就揣在怀里。但他忽略了两点：

一、北大荒的住房，无论是低矮的草房子（那是1956年农场草创时期盖的，现已破旧不堪，多无人居住，但老孙仍然住在这种草房子里）；还是以后陆续盖的砖瓦房（诸排长住的就是这种房子），两种房子的门框都无法拴绳子；

二、其次，即使门框可以拴绳子，以他这样病残之躯，怎么可能站起来把绳子套在一人高的门框上呢！

所以，孙阳武发现是给自己安排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想明白，孙阳武的最后一丝力气也泄光了。

咋办？

孙阳武想：反正我也是不打算回去了，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死在诸排长的门口！不能吊死，我冻也要冻死在他门口——我就是告诉他，我死了以后作鬼也要闹得他家宅不宁！

于是他索性闭上眼睛，哆嗦着用冻僵的手指解开破棉袄的扣子，让极冷极寒的冰雪直接堆在自己瘦骨嶙峋的胸脯上，以求速死……

天下就有极其凑巧的事——或许，老天爷不忍心看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样自我了结吧——

就在老孙僵卧雪中、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的时刻，大概也就间隔了一两分钟，积雪覆盖的小路上有人走过来。

这人是猪号打夜班的饲养员老徐。半夜十二点后，他见风雪停了，便拎着一盏马灯、趟着没膝深的积雪，去伙房打夜班饭。

他摸索着在雪中蹒跚而行，在马灯昏黄的、摇曳不定的光线中，他突然隐约看见，路中间原本平平的积雪中，怎么会出现一道沟、一道宽两尺左右的沟呢？更奇怪的是，这不像是以前就有的，而是刚刚出现的，他便顺着这“沟”走去，打算一探究竟。

跟着这“沟”，他走到了路口拐弯处，这是距离诸排长家不远的地方，他发现“沟”的尽头隆起了一个不大的雪堆。

这是怎么回事？

他走近用马灯照照，模模糊糊好像是一个人形，啊呀，不对！弄不好是个人吧！他赶紧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扒拉开雪堆，果然是一个人！摇晃摇晃那人身体，没有反应；摸摸那人的脸，冰凉！手探到鼻孔前，似乎感觉不到气息，是不是死了？他想赶紧跑去叫人，走了几步又折返回来，把马灯放在一旁，弄干净那人胸前的冰雪，跪在路上，把耳朵贴在那人胸前，屏息听了听，感觉到还有微弱的心跳！又抹了抹那人脸上的积雪，仔细辨认一下——咦？这不是老孙吗？他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接着，老徐隐隐约约看见解开的破棉袄里露出的麻绳，看着老孙身体及头部的指向，老徐明白了。

于是，他两手伸到老孙身子下面，把孙阳武抱起来，又弯下腰，伸出一个手指，勾住马灯的提梁，然后抱着不足一百斤的老孙，吃力地在雪中趟着、向老孙家走去。

老孙经过这样一拨弄，居然有点儿醒过来似的，老徐一边走着，对着他的大声耳朵埋

怨道：“老孙！你怎么走这下道啊！”停顿片刻又感叹说：“咳，好死不如赖活着……”

老孙啜喏着以极微弱的声音说“你，你甬管我……我，我死！我死也死在……他……家……”

四周是死一样阒寂。天地仿佛是一个阔大无边的太平间，积雪不过是蒙在死尸上的白布……

第二天，全站都在交头接耳地传开了孙阳武这个“临终一举”，人们明白，这都是因为积累在老孙心里的、对诸排长的恨太久了、太深了……但没有一个人公开说什么，也没有一个站领导去老孙家看看、表示慰问……

张老婆子当然是气炸了肺，她觉得是大大丢了她的脸。她恶狠狠地骂道：“你狗日的死给谁看啊？死给俺看？俺才不吃你这一套？有能耐你死了别回来啊！日你个亲娘祖奶奶的！”

没过多少日子，孙阳武真的死了，他死于严寒造成的急性肺炎并发心力衰竭（医生事后分析的）。他死得悄无声息，是张老婆子找人悄悄拉到北边树林子里埋的，站里许多人都不知道。■

2009年旧作，

2016年3月23日—8月16日重写

【述 往】

## 北大荒记忆

季超男

### 查 夜

迷迷糊糊之中，我被人推醒了，一个低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哎，起床起床，该你们了。”

我“腾”地坐起来，霎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赶紧穿衣服，一面就小声叫起了身边的小毛小沈小闫几个女孩，悄没声地，几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全副武装：棉裤里套上了毛裤，棉鞋棉袜里再塞上双毛袜，圆圆滚滚地站好，然后笨重地挪动着双脚，走到冰天雪地中去。

轮到 we 查夜了。

好像是 1971 年初，珍宝岛硝烟弥漫，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后，全兵团都进入了战备状态。虽然都是“兵团战士”，虽然离珍宝岛只有 400 里，但除了打野猪的几杆枪外，我们连真枪的模样都没见过。我们这生产连队的“战备”就是由青年排执行的夜间巡查。

这一夜格外宁静，风停了，没有月亮，满天星星闪烁，好像伸手就能够摘下来。不过多数人没有这个兴致，半夜睡得正酣被骤然叫醒，胃里热热的好难受，头也胀胀的，小沈她们困得滴里搭拉的，走出门半天了眼睛都没睁开。我们是今夜第三岗了，一岗 4 人，两小时一换，200 多知青轮班来。

查夜除了看牛棚马号机库粮仓外，最重要的任务是到各家各户去巡查，以防“苏修”特务什么的隐藏到谁家里去。我们打着手电，从村东口路北老李家开始，一户一户查下来，直到村子大西头老宋家；再翻到后排，从西头查到东头。全连几十户人家，无论反革命还

是贫下中农，无一例外。

到每家程序都是一样的：推门（家家睡觉都不插门，是货真价实的“夜不闭户”），进入堂屋兼灶房，拉门，进里屋，用手电逐一扫过炕上的男女老幼，证实没有问题，退出，带上门，奔下一家。

全过程中，只有我们扑噜扑噜的脚步声，踩积雪的咯吱咯吱声，轻轻的喘气声，忍不住的咳嗽声；老职工家里很少有什么动静，有的人家连呼噜声都没有。迎接我们的，只有几声懒洋洋的狗叫，开始那些天狗咬得好凶，后来大概狗也见怪不怪了，见人来了，哼哼几声了事。

两小时到了，一遍也查完了，还是和往常一样，没什么情况。于是走向宿舍，叫起下一岗的人，赶紧倒头睡下，又困又乏，明天还得干活呢。

查了多久我忘了，怎么结束的也忘了，无非是生产任务呀，新的运动呀，什么的一冲，自然让路了吧。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既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也没有遇见任何不愉快。每一家都睡得那么熟，每双眼睛都闭得紧紧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男人还是女人，东屋还是西屋，家家如此。

家家如此，次次如此。

说实话，刚下达查夜任务时，反帝反修的激情，抓“苏修”特务的刺激，烧得我们好几天就睡不好觉了。可是渐渐的，也不知怎么搞的，就变成今天这样的例行公事了。我们只是以那个时代青年人特有的认真与服从，努力完成着这个不知为什么要执行的任务。

那些青年中我算大的，那会儿都快23周岁了。可是我却从来没想到，半夜闯到别人家巡查，这有什么不妥。在我的心里，这就跟马玉涛唱的《老房东查铺》似的，和巡查军营没什么不同。我也根本没想到，夜里，每个家里，会有些什么事情：每天夜里扑噜扑噜地来这么几拨人，人家心里会有什么感受。

直到20多年后的有一天，我才突然醒过闷儿来问自己：我们每次进入老职工家，难道他们真的都是睡得那么熟吗？为什么从来没听谁说过梦话、咬过牙、起个夜什么的？为什

么每一双眼睛都闭得那么紧？

于是我不禁毛骨悚然——在那些紧闭的眼皮后面，有多少灼人的眸子盯着我们，有多少戒备的心对抗着我们！怪不得当时下达这个任务时，老职工中没一个人应承，从老连长那儿就把它推给了青年排；青年排中老职工的子女也不参加，一股脑推给了这帮傻乎乎的知青。

并没有人提出过“以谁为敌”的质问，全连恐怕也没一个人懂得什么叫“侵犯隐私权”，但是，就和古往今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样，当人的尊严一旦被伤害，人的权利一旦被侵犯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反抗，尽管有时是无声的，就如同那些紧闭的灼人的眼睛一般。

唉，那时候，我们这帮傻知青！

### “把×××揪出来！”

这个记忆其实是一直固执地活在我的意识中的，在深处，就像要露出水面的岩头，薄薄地迫近，等着把它唤起。怎么唤起的？记得好像是近二十年前，偶然看了权延赤的《陶铸与曾志》，看到陶铸被突然“揪出来”，于是，喷薄而出，“把×××揪出来！”的记忆就一连串流水般涌出来。

1968年6月我们来到北大荒，正值兵团组建，尔后，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来，记忆中有什么“清理阶级队伍”“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打三反”……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把×××揪出来！”的喊声。

情况总是这样的：全连男女老幼聚在文化室按部就班坐好，先共同背诵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宣布开会，工作组领导先作讲话，然后依次发言，开头都是诸如“红旗飞，战鼓擂”，内容多是“阶级敌人心不死”之类，开着开着会，发着发着言，突然一声炸雷：“把阶级敌人×××揪出来！”顿时整个会场死一般寂静，随即就有几个人冲入人群

中，拉拉拽拽揪出一个人，胳膊往后一拧，头一按，开始批判。此时口号声响成一片。

后来我看出来了，发言揪人带领喊口号的都是事先布置好的，是运动“积极分子”。那气氛，真挺有震慑力的，别说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了，就连我们这些没一点瓜葛、被视为依靠力量的知青，坐在会场上，一听炸雷般的“把×××揪出来！”都禁不住头皮发麻，心里头真有点惊惊的；再想想，与自己无关，惊魂才渐渐定下来。

记得的“牛鬼蛇神”中最先揪出来的是贵××、李××，据说分别是日伪时期的警官、地主：后来逐步升级，揪“现行反革命”，连大人带孩子带知青接连揪了一大串。然后“牛鬼蛇神”们就被关进了劳改队。每次吃饭都能看见看守人押着这队老老小小的进来，先向毛主席像弯腰请罪，然后依次自报家门交代罪行，然后领一份饭，躲到角落里匆匆地吃，干的自然是最脏最累的活，永远是低着头，好像随时准备被揪出队列批斗，而每次开会，一定是先把他们揪来批斗一顿。劳改队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好像都只有12岁，据说都是“喊反动口号”被揪进劳改队的。那两年小学校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层出不穷地出现喊“反动口号”、写“反动标语”的现象。那男孩的爹据说是地主，就在劳改队里，一老一少，父子同行；要说男孩因父亲被“专政”喊喊口号发泄发泄倒也还说得过去，那女孩“根红苗正”，不光她家、连同叔叔大爷村里一连串的亲戚全是贫下中农，她自己又是红小兵的什么干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经常在台上跳跳蹦蹦的，却也不知为什么喊了，被揪出来了。男孩有时还显得有点不大在乎破罐破摔的样子，女孩则永远是低着头，腿弯着罗圈样的跟着这队被押着的劳改队后面，据说女孩在劳改队里还差点被欺负了。每天看着俩小孩像小尾巴一样跟在劳改队后面，心里真不是滋味。

在那个畸形的年代，就出这种畸形的事。

“牛鬼蛇神”中还有一个是我们北京知青，还是第一批自愿来支边的，我在怀念老顾的文章中写过他，就是自恃出身好，有点调皮捣蛋，可能是牢骚怪话或者日记什么的有点出圈，结果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揪出来”的人中让我最难忘的是廖家昌，四川人（？）复转军人（？），拖拉机手。我们刚到连队时，他宰了狗烹得香香的，把我们十几个

人都请到家去吃。这是我活到二十多岁唯一的一次吃狗肉，好香啊！他被揪出来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他的小儿子上小学二年级，说是喊反动口号，学校追问，据说孩子说是他爸教的，于是廖家昌就被揪了出来，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关进劳改队。劳改队里免不了挨打，加上无休止的批斗、精神体力诸多折磨，据说肾脏坏了。1972年中我离开连队时，这个三十岁出头的壮汉，已然是皮包骨头，脸色青黑，一双大眼睛耷耷着，黑洞洞的好吓人。直到几十年后，一看到甚或听到人们吃狗肉，我脑子里立刻就浮现出老廖那副皮包骨头的模样、那双深耷的吓人的黑洞。听说文革后，落实政策，他什么问题都没有。那小子长大了，对自己瞎说害了父亲痛悔不已，异常懂事，体恤父母，勤奋刻苦读书，终于考上了外面的学校。事情终于有了好的结局，可是人一生最好的时光却永与他无缘了。

1998年回访农场在连队见到了他，想不到的是他满面红光，除了头发白了点好像和1968年我们初见到他时一样！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真对不起，当年我们批判你……”他呵呵笑着，说：“没什么，这不怪你们，都过去了！”

我见识了一个真正的北大荒人，胸怀像大荒原一样宽广坦荡的北大荒人。

### 运动——“砸烂资产阶级糖罐子！”

这题目听起来实在荒唐，可事实上就确曾有过这么回事。那是1972年春天，4、5月份吧，连里掀起了一场气势逼人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名曰“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运动”。自从68年我们来到建设兵团，运动就没断过，“割资本主义尾巴”呀，“清理阶级队伍”呀，“一打三反”呀什么什么的，我们无非是跟着喊喊口号，举举胳膊而已。可这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刻骨铭心，因为它特别：矛头对准的是我们知青——运动一起，就先抓了两个上海知青当典型，展开了猛烈的批判，然后横扫青年男女排的“资产阶级腐蚀”现象，层层动员，人人触及灵魂，不当革命的动力就是革命对象。

运动来得真猛，发展得真迅速，先党员再排、班干部再团员，中间穿插着各种骨干会，



一层一层地动员、布置。开会回来的，个个脸上抑制不住的严重与兴奋，没开会的，自然个个心中惴惴的，拼命睁大了眼睛张开了耳朵伸长了鼻子，想捕捉点信息，一旦得到了要去开会的通知时，顿时兴奋难抑。及至指导员大会动员前，青年排多数人都已经被动员过了，所以大会一动员，青年排立刻全面开花，运动一下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人人写决心书，全连搞誓师会，“革命舆论造得浓浓的”，大标语不仅贴满了大街小巷、会场内外，连宿舍的床柱子都糊严实了。然后“大批判开路”，班、排、连，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批判会一个接一个，人人都写批判稿，个个会上都发言，口诛笔伐，上纲上线，火药味浓到了极点。那俩倒霉蛋典型——一个不遵守纪律不服从领导，比如早晨竟敢不起床上工，另一个打架斗殴——别看平时又蛮又横一副谁也管不了的劲头，三下两下的批判，就乖乖地低了头，大会检查小会认罪，痛心疾首地自我批判。

初战告捷，迅速扩大战果——横扫青年男女排的资产阶级腐蚀现象。说起来，兵团知青和插队知青最大的不同恐怕就是更老实听话守纪律更正统，因为我们过的是半军事化的生活；也更封闭：我们连离最近的连队也有十来里路，没时间也没条件去串联；71年探亲假后，我带回来全连唯一的一台收音机，短波还被焊上，电池用完了都没处去配，要不是自己订份解放军报、平时学学毛选的话，精神食粮的唯一来源就只有全连大会听指导员连长传达文件念报纸训话了。我们女孩子当然更老实更乖更守纪律也更纯洁了，我们的“资产阶级腐蚀”表现在哪里呢？指导员为此专门在动员大会上指出女排问题：女排“有人出工不出力”，扭扭捏捏，简直是“给锄把子号脉”；有些人讲吃讲穿，看看宿舍里那些糖罐子，一张嘴就是吃呀穿呀；更有些人，留恋大城市，探亲假回来，或情绪低落，或津津乐道城市的生活方式，扎根思想不牢，革命意志衰退，还有……谈情说爱！

“砸烂资产阶级糖罐子！”这个口号，就是在那时候，不知是谁综合、发挥了指导员的话，想出来写出来贴出来喊出来的。“革资产阶级糖罐子的命”，在女排也搞得最热闹。我们先是闹闹哄哄地贴标语，自己把自己的窗户、门上、双层床铺的木柱子上都贴上红红绿绿的标语。后来，不知是谁倡的议开的头，开始还是三三两两的，后来就呼啦啦涌到连部，

手里捧着、怀里抱着平时藏藏掖掖舍不得吃的小零食、白糖之类，上交了。

我从来没有过这些东西，来兵团四年了，不知小灶为何物。但是这次我也沾了边：这年冬天我得了一场类似出血热的重感冒，高烧十几天不退。我的好朋友朱小莹在团宣传股工作，闻讯赶了三十多里路来看我，带给我一个糖水罐头，我把它摆在床铺上，两三个月没舍得吃。赶上这场运动，我也把它上交了。

为什么糖罐子闹得那么热闹？现在想想，大概首先这东西比较普遍，那些上海“阿拉”们，吃不惯苞米馃子窝窝头，刚来时一开饭就哭，这二年有了探亲假，她们带回点白糖之类是必然的。不过我想这只是表面原因，深一层的原因恐怕在于这个“罪状”最明显但性质最轻，而其他几条呢，哪一条摊上也够你一呛！谁不愿当革命动力而去当那“对象”呢？何况那时的青年哪个不要求进步、不想入党入团得到组织信任呢？

说不太清楚那时的心境了，但那闹闹哄哄的氛围却难以在记忆中抹灭，每个人都有点咋咋呼呼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既紧张畏惧又充满了兴奋乃至亢奋的气息，很有点“咸与维新”的味道。

我从小就懂得唱“下雨泼街假积极，刮风扫地假积极，监狱里捉特务假积极！”，对假积极深恶痛绝，文革中因为不肯违心很吃了些苦头。可是这一回，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自己积极举动后面的做作，自己的闹哄，咋呼。因为我心里“有鬼”。

在抓了俩破坏纪律的典型后，又抓了个谈情说爱的典型批判，作为运动发展的新阶段的标志。这是个哈尔滨女孩，有二十一、二岁了，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整天笑嘻嘻地笑，又爽气又热情。她和一个天津知青在宿舍下面的砖窑里“谈情说爱”，被烧窑的看见汇报了。于是她也是大会批判小会检查，一次次认识、过关，天天痛哭流涕的。当时的具体情况，我记忆中的，就只是她站在会场前，深埋着头，念手里的那份检查，一边念，一边抹眼泪。说实在的，亏了她那男孩儿似的性格，否则……

再回头说我。那阵子，只要一听“资产阶级谈情说爱”我就心跳，看着她在台上检查，我就抬不起头来：远在千里外的故乡也有一个人，尽管是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但心中

那份情感，却是刻骨铭心的。虽然除了心里萌动的那份情感外，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以我那清教徒似的道德界限，也不可能发生什么），但是我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坦然地面对这样的批判会，更张不开嘴去评判她。在我心里，真的也认为谈恋爱这种事不光彩，起码是革命意志不坚定，理想不远大。所以我心虚。可是，形势咄咄逼人，我又是班长、团员、“骨干”，上头逼着我，下面看着我，又加上“探亲假归来情绪低落”、“讲究（吃）穿”，我不积极就要引火烧身，怎么办？我那跟着闹哄，咋咋呼呼地贴标语交罐头之类举动，是一种自觉不自觉地假积极。我一生中头一次体会到了“蒙混过关”的境界。

写到这里我想起巴金先生《一颗桃核的喜剧》中写他文革中挨斗，蹶在台上被逼着喊“我有罪！”心里却觉得这批斗会是在演戏，那些批判的发言的又何尝不在演戏呢！？又想起林语堂先生30年代在《吾土吾民》一书中说到的中国人的幽默：

极富闹剧性质的葬礼仪仗是中国式的幽默的象征，其实质是只求外部形式而全然不顾其实质内容。能够欣赏中国式幽默的人势必也能正确理解中国的政治方案。政治方案和官方宣言也只是一种形式，大多由那些精通模棱两可而言过其实的术语的书记们起草，正如有专门的商店出租葬礼仪仗用行头一样，没有一个聪明的中国人会一本正经地对待它们。当初看这段话时，新奇是新奇，但怎么也体会不出来。今天坐在这里写这篇小文，我突然悟到了个中真味，不禁由衷赞叹林语堂概括之精妙深刻。

运动后小莹听了挺生气：“噢，还把我辛辛苦苦带给你的罐头当资产阶级交了！”我没法解释，说也说不清楚。倒是她的话使我心里泛起了丝丝狐疑：

“她怎么会这么不理解？运动，不都是你们团部机关搞下来的吗？” ■

【述 往】

## “起锚”后补

### ——生死兄妹情

黄东汉



（文中主角陈新扬与陈秀珍兄妹）

今年夏天，机缘巧合我在香港认识了阿扬与阿秀这对陈姓兄妹，阿扬精神奕奕，红光满面，为人热情健谈，一点都看不出他已年68岁，曾经中过风的样子。阿秀身材高挑苗条，声音甜美，虽已年64岁，但清秀的脸庞仍透露出昔日的骄美。果然当阿扬拿出他们年轻时的照片来，二哥阿扬丰神俊朗，风度翩翩，四妹阿秀则容貌秀美，也为一俏佳人也。这对兄妹和我们一样，都是当年勇于反抗封建专制独裁，勇于投奔怒海的叛国者。人生有一次频死的感觉已十分可怕，但阿扬在偷渡中就有两次频死的感觉，所以他现在很开朗，他对我说：“现在过一天就多赚一天，天天都要令自己快活”。

这对兄妹小时原本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49年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令到他家陷入困境，62年母亲亡故后，4兄妹分别为4个家庭收养，一家人从此各散东西，上山下乡后他俩历经艰辛，九死一生，终逃抵香港，开始新的人生。

他们的父亲年轻时曾就读于广州黄埔军校燕塘分校，并于那时加入国民党，蒋介石是他的校长，国民党名将王耀武，胡宗南是他的师兄。不过他并没有在军校完成学业，所以也从没带过兵，更加没有打过共产党，原因是他家族是广东台山市的名门望族，在台城拥有庞大的地产及生意，他家台城的“顺利行”操控了台城的经济，是台城首屈一指的买办阶级。由于他父亲是长子嫡孙，因此中途辍学回台山接管家族生意。

日本全面侵华后，日本军机轰炸台山时，不知为什么所掉的炸弹炸中的大多是他家的物业，曾有一个炸弹击穿了几层楼却没有爆炸，把一家人吓得半死。经过抗战后家族在台城的物业和生意荡然无存，家道从此一落千丈，他父亲便和母亲一起迁到广州，一切从头再来，其间大哥硕桐46年出生，二哥阿扬48年出生，稍后又添了个三女，至于阿秀则生于解放后的1952年，一家人居住于广州西关逢源路一间租住屋内，父亲则以做小生意为生，一家人倒也温饱无忧。

1953年镇反运动中，不知是谁揭发了他父亲的历史问题，公安局把他抓了，最后判了个历史反革命发送内蒙古劳改。他父亲知道判决后，知道自己这一生已经无希望了，为了不影响4个子女，便在起解前在牢房里签署了离婚协议。他这样做大错特错，因他这个历史反革命兼劳改释放犯永远是他们兄妹的父亲，永远影响着他们。7年后他被释放回广州，却已妻离子散，无家可归，景况凄凉。

父亲被捕后，坚强的母亲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她挑起菜担上街卖菜，有时摆地摊卖些风味小食及一切可赚钱的东西，这样辛辛苦苦做小贩赚钱养育4个儿女。一个女人养4个小孩很困难，故最先被送走的是阿秀的三姐，阿秀回忆说，在她很小的时候，好命的三姐被香港的姨婆看中，收养了她带到香港生活，剩下她兄妹三人陪伴母亲过艰苦的日子。

对他家来说真是福无双至，却祸不单行，母亲做小贩养家艰难的过了三年，1956年中，

广州市要压缩城市人口，他们这个家庭自然是压缩的首选。不久母亲带着三个分别是10岁，8岁和4岁的儿女被遣送回台山乡下。家乡已没了直系亲人，母亲既不黯农活又没有农村妇女的体力，一家人顿时陷入绝境。这时乡中有一个人，与他们同姓，这人在生活和农活中帮了他母亲很多，母亲对他很感激，由于与父亲已离了婚，故不久那人就成了他们的继父。继父原来也是国民党兵，被俘后当了解放战士，后随军南下，当他知道即将要打海南岛，要和昔日称兄道弟的国民党军再战，便立即申请退役回乡参加土改，土改后便成了乡中干部。

他们艰难的在乡下生活了两年，1958年当知道有政策让他们可重返广州时，便举家一齐返回广州，其继父也跟着他们一起到广州。阿扬回忆说他们回到广州时看到到处都是土法炼钢的小高炉。母亲照旧卖菜为生，继父则从旁协助，主要是到菜栏去买菜，然后运回来两人一起卖，三兄妹这时也大了一些，故有时也会到档口帮忙。为了生活母亲和继父有时也会干些炒买炒卖的勾当，阿扬回忆说，在那经济困难时期继父回到乡下以二角钱一斤买鹅，运到广州可卖到20元一斤，平安出手的话也可为这个家庭解决一下金钱问题。

1960年父亲从内蒙古劳改释放归来，幸亏他释放得早，回到较富裕的南方，如果劳改多几年，在那大饥荒的年代肯定会客死内蒙。可他回来已是妻离子散，无家可归。为了活下去，这个昔日商场上的高手最后沦落到在广州沙河区一间民办中学做校工，为了能见见儿女，他顽强的活了下来。

他们三兄妹与继父相处的时间并不长，1960年中，他们异父同母的五妹出世了，这时他们的继父，这个原国民党降兵，终于也抵受不了穷困的生活，抛妻弃女只身偷渡到了香港。继父走后母亲独力支撑一个有4个孩子的大家庭，倍感吃力，不久她终于倒下。1961年母亲被诊断患了癌症。那个年代穷人得了此病，必死无疑，他母亲被病魔煎熬了1年，终于在1962年中，带着对丈夫与儿女的牵挂撒手尘寰。

大哥硕桐这时已是广州12中学的初二生，平日就轮流寄居在几个亲戚家，二叔，四叔，外婆和舅舅的家轮流住，10岁的阿秀则先在二叔处住，然后搬到四叔处。至于二哥阿扬那

时刚刚小学毕业，当时有个政策学生可以在暑假赴港澳探亲，阿扬便和异父同母的五妹一起申请，合该他时来运到，申请很快获批，很快阿扬就拖着刚会走路的五妹步过罗湖桥到达香港。在香港他把五妹交还给继父，自己则到亲戚处住。

14岁的阿扬这时想继续学业，但香港的小孩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英文，到中学时基本上已是全英文教学了，而他这个大陆仔连字母都认不全，留在香港肯定不能进学校。在亲戚家住了半年，为了寻求出路阿扬曾到亲戚开的藤器加工厂做学徒，工厂包食宿，学徒工每月还有7块钱工资，当时藤厂一个熟练技工每月才赚廿元左右。阿扬在藤厂当了半个月的学徒，一来他认为藤器加工技术含量低，没有前途兼赚不到钱。二来他心中想的还是要读书，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大哥就读的广州12中门前的大鱼塘及校内的足球场。几经考虑后他作出了一个艰难而当时令人惊讶的决定，辞掉藤厂的学徒从重返广州读中学。1962年底他如愿已偿以插班生进入广州12中就读初一。

1959—1962年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当年的广东省发生了大规模的逃港潮。为了压抑这股逃港潮，当局开足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向人民大肆宣传香港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穷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还是社会主义好。阿扬的归来就读被省市领导看中了，成了他们所宣传的人证。首先在12中校领导引导下他在香港读不了中学是因为穷，完全不提他不会英文，而他在藤厂当了半个月的学徒就被特别加强渲染。就这样他的发言变成了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香港里，他因为贫穷而没能入学，为了生活只能去当学徒，而当学徒工又受到资本家残酷的剥削，生活水深火热，但一回到社会主义的祖国，马上就进了中学，生活幸福快乐。这样的发言完全符合当局宣传的需要，他先在12中内对全校师生演讲，来听他演讲的还有其它中学的代表，继而还要到青年宫去演讲，为当局宣扬香港是穷人的地狱，还是社会主义好，而他通过演讲渐渐成了广州中学生的先进典型。

正当他在演讲台上意气风发，口沫横飞时，讽刺的是他的亲妹，那个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广州，寄养在二叔家的阿秀却突然退了学。母亲死时10岁的阿秀正读小学三年级，寄养到二叔家后，一来她不是他们亲生的，不想花钱供她上学，因她是女孩迟早要嫁人。二来二

叔也有几个孩子，生活本也不宽裕。他二叔是在广州粤剧团拉二胡的乐师，他不是把阿秀带回去进行教养，而是把她带到粤剧团做超小童工。那时剧团的正印花旦刚生了个二女儿，那花旦的大女儿是二婶带的，因此二叔就把阿秀领到剧团里帮那正印花旦背孩子。阿秀吃住都在剧团，白天一起床就到花旦处领取婴儿背上，那花旦每天都要排演，练声及演出，阿秀就背着她的女儿在剧团里混，除了婴儿吃奶时交还给该花旦外，一天有十几个小时要看护婴孩。粤剧团经常要下乡演出，晚上睡觉时正印花旦都有一个房间，而阿秀就只能跟那些二帮“梅香”姐挤在一起，在乡下她这个编外人员遇到缺乏床铺，经常要睡地板。阿扬在香港当的是学徒，但比他小4岁的阿秀却是实实在在的童工。阿扬的学徒也有工资可拿，而阿秀没有工资，只有两餐饭吃。阿扬学徒只干了半个月，而阿秀无偿的帮花旦在剧团里带了1年多的孩子，孩子会走路了，花旦怕11—12岁的阿秀看不住孩子，怕有什么闪失就不要她带了，而阿秀就搬到四叔家去住了，两相对比可笑不可笑。

三兄妹自母亡后就很少见面，大哥二哥在亲戚中到处流浪，四海为家，以至阿秀很多时都不知道他俩住那里，只有逢年过节或家族中有红白大事，三兄妹才有机会重聚。阿秀住进四叔家后曾短暂重返小学，但只读到小学4年级就终止了，理由和在二叔家时完全一样。长期的寄人篱下，小小的阿秀学会了忍，无论什么事她都从不与堂兄妹或表兄妹争。为了争气不白吃别人的饭，自己养活自己，比二哥当学徒时年纪还要小的她，一停学就到街道服务站参加工作。年纪小小的她先是干撕碎烟叶的轻工，长大一点就开机器压制电木胶瓶盖。工资虽然低微，但她省吃俭用，除了养活自己外，几年下来也有了些积蓄，1968年底大哥下放海南岛，一身的行李都由她出钱购置。

他父亲这时也想见见自己的儿女，但因两儿行踪无定，故见得最多的是阿秀。二叔，三叔和一个姐姐和他一样是国民党员，偏偏只有四叔是共产党员。父亲每次见阿秀，他这个“四类分子”不敢直到4弟的家，在那阶级斗争空前激烈残酷的年代，他不想给任何人带来麻烦。父亲先打电话到四叔附近的传呼站，阿秀收到电话后就立即出来，两人相隔十几步向同一方向行走，去到附近的公园或少人处才停下来相见，过程就象当年共产党的地下



特工秘密接头一样。每次见面小小的阿秀对着年老而又陌生的父亲都不知说什么好，在那物质奇缺的年代，很多时大家都无言以对，互相呆望一会感到对方还好就分手。这情况直到80年代父亲平反了而他们又可回来，才又恢复父慈子孝顺的局面。

风光了三年，1965年二哥阿扬初中毕业了，他考虑到自家的情况，想快点出来工作便不报考高中而报考中专，当时他和一个成绩比他差很多的同学一齐报考市轻工技校，考试中他自我感觉考得不错，但一发榜那成绩差的同学考中而他却名落孙山，他百思不得其解。几年后他终于知道了真相，文革中他成了农场造反派的头头，在一次造反行动中他率领革命群众砸开了农场的档案室，他亲眼看到了自己的档案，档案里明明写着他考中了轻工技校，他却不明白为何收不到录取通知书。一次偶然的会他重遇了当年的女班主任，两人谈起这事，那女班主任坦率承认把他的录取通知给了另一个成绩差的人，是她亲手干的，但那是上头的命令，谁叫你的父亲是劳改犯而人家的父亲是党委书记。阿扬还从班主任的口中知道那个夺去他学位的人考4科总分才刚100分，更加为之气结，但已成事实无可奈何，知道是反动的血统论剥夺了他读书的权利。

1965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展开，那些升不了学的中学毕业生当局都要动员他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阿扬既是广州市中学生先进的典型，那他就要先进到底，加上他的家庭环境问题，更需要他尽早独立，于是他便带头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去了珠江口的斗门县国营平沙农场。平沙农场很大，光知识青年就有几千人，主要以种植甘蔗为主。阿扬的好运似乎还未完结，由于他是自愿来的，来前又是广州中学生先进的典型，所以一到农场立即受到重点培养。他不到一星期就加入了共青团，并立即参加了农场的四清工作，在他的整个农场生涯里，做农活不超过十天。二个月后当了团支部书记，农场团委委员，在文革前夕他还通过了入党申请，成了一个预备党员。他回忆起在农场搞四清的这段日子说，对于农场的生产队的干部来说，四清运动比文革更惨，那时他们早已被免职，由工作队指挥生产，天天对他们进行批斗，要他们交代问题，而文革主要斗争农场的领导。

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一开始，他这个新鲜热辣的中共预备党员因缘际会成了农场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头头，继而成了有几万群众的省农垦造反派“红司”的常委，主管“红司”日常一些锁事。那时他长驻广州沙面的农垦总局，因而结识了很多其他造反组织的头头。阿扬回忆说，其实偷渡这种思潮在文革初在高干子弟中就普遍存在，尤其是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子女，过去他们高高在上，而今成了黑七类之一，他们掌握了很多边防信息，很多都想走。他们知道阿扬是从香港回来，迟早都会偷渡回去，因而很多时在空虚苦闷之时，都会向他吐露想偷渡的心声。不过这些人最后走上偷渡的并不多，原因就是他们是高干子女，在株连政策之下子女偷渡更会令父母问题更加严重，其他就是高干父母还有解放的一天，他们还有希望。

在长驻广州沙面总局的日子里，白天他们表面上热衷搞文革，晚上无聊时几个知心老友就常在一起谈前途，讲偷渡。1967年中阿扬与几个懂音乐的高干子弟造反派头头，花了很多晚上，创作了很多有关偷渡的歌曲。歌曲由一个绰号叫“古巴仔”的人谱曲，其他人共同合作负责填词。他们所创的偷渡歌有粤曲，有用语录歌稍加改编而成，也有些属于他们的全新作品。这些歌曲后来经过时间的淘汰，很多都不流行了，但粤曲及一两首创作严谨的偷渡歌，后来却在知青中广泛流行，其中一歌取名“夜奔”，表达了一个即将踏上偷渡之路的青年对女友、家乡及父母依依不舍的复杂心情。想不到几年之后，此曲竟然在偷渡者之中广泛流传，很多人都会唱。阿扬因为是原作者之一，因此记忆很清楚，四十几年后他还可以一字不漏为我默写出来。

一个漆黑的夜晚我登上小舟，拚命划动双桨奔向远方。

大海在呼啸在怒吼，四面一片白茫茫，

看那无情的浪头一浪高一浪，我爱在大海颠簸流浪。

无论我飘泊在何方，往日友情永不忘。

再见亲爱姑娘！亲爱的朋友！

为了自由只能和你们分离，无论我飘泊在何方。

往日的友情永不忘。

啊！你汹涌的浪头请将我抛向远方，

我要像你一样翻滚在大海上。

阿扬所在的省农垦造反组织“红司”成份相当复杂，其中有赫赫有名的6123兵团，有工读600等，就连他的平沙农场65·9战鹰也是响当当的。这几个组织当时主要目的是要共产党讲信用，让他们回城。为了达到此一目标，也为了能令广州的造反派接受他们，因而这几个组织在武斗中特别凶悍，为造反的红旗派特别卖命。然而他们的目的与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政策相违背，所以注定要失败。阿扬在大陆的好运即将终结，1967年底武斗一结束，省军管会立即把阿扬逮捕，并立即押回平沙农场关进牛栏。

昔日农场的大红人，如今变作阶下囚，他是作为文革群众组织的坏头头，由省军管会交由农场代为看押的，在长达多年的牛栏关押中，他被万人批斗过三次，不像一同关押的几个老革命，农场的走资派那样经常要拉出来批斗。昔日他因离开香港返国读书而成为大红人，而今却因同一理由而被怀疑成国民党特务，批斗他时要他交代在那时代人人都想去香港，他为何会反而回国，不是特务是什么？要他交代如何跟上面接头及如何搞破坏，要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阿扬也明白到如果相信共产党的坦白从宽那就大错特错，何况他又不是真特务，所以无论怎样批斗他，他都拒不承认，而且不断上诉。一个专为他们送饭的女看守，因为同情他，经常在送饭时暗中为他传递消息及信件。阿秀当年15岁，知道二哥在农场被囚禁，便立即携同年仅7岁同母异父从香港回来探亲的五妹，经一天的舟车劳顿从广州赶到平沙农场探监，在牢房外看守人员只准把东西带进去，却不让他们兄妹见面，在里面阿扬听到了她俩姐妹的哭声和叫声。在牛栏中他知道1968年11月大哥硕桐去了海南岛兵团种橡胶，四妹阿秀12月去了惠阳县插队务农。在多年的囚禁中，他彻底的明白了他在这个国度里已没有将来，一旦放虎出笼他也要“夜奔”了。

至于四妹阿秀 1966 年文革开始时已经 14 岁，正常情况下这个年纪应该是初中一年级，可以参加文革了，可她由于是寄养在四叔家，过早停学参加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因而只有小学 4 年级的文化程度。由于亲生父亲是劳改释放犯，而四叔是共产党员，所以更加不敢乱说乱动。1968 年底城里中学生被送到农村去接受所谓的“再教育”，本来根据当时的政策，阿秀的二哥早已去了平沙农场，大哥也即将远赴海南岛种橡胶，她这个小妹完全可以留在城市，但这时街道服务站工作时有时无，加上她的户口是在四叔处，四叔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女不用到农村，不断的向她施加压力。为了不用看四叔的脸色及听到难听的说话，也为了早日能自立，在 68 年 11 月送走了大哥到海南岛后，1968 年 12 月年仅 16 岁，只有小学 4 年级文化的她便自动在四叔的街道报名下乡，很快她也算作知青被送去接受“再教育”了。

阿秀被分配到广东惠阳县潼湖公社琥珀大队一条小村插队，同去的广州知青共 10 人，另有 24 名惠州知青。这 34 名知青后来绝大部分参与偷渡，有廿多人最终获得成功。她下放的小村邻近东江河，三面环山，土地贫瘠，田少人多，当地农民原本就生活贫困，大部分人都住在泥砖屋里，他们刚到时看到村民吃饭时碗里有些白色的东西，初时以为是猪肉，走近看了才知道那是盐腌萝卜，原来当地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特大的瓦缸，在萝卜收成的时候用来腌制咸萝卜，一年之中很多时候就靠它佐饭了，阿秀走近那些大腌缸，隐隐约约闻到有些臭味。这条小村一下子增加了 34 个劳动力，收益更加被摊薄了，那时一个男全劳力干一天才得 1 角 2 分钱，妇女就只有 8 分钱，阿秀初来时本以为凭努力可以独立生活，但不久这希望幻灭，初来时的积极性立马泄了气，干一天连饭钱都不够。尚幸当地地位处宝安县北面，是从东线经大鹏湾偷渡香港的绝佳出发点。那时从广州到惠州比较容易，检查比较宽松，她是当地知青能开到往返广州的证明，因此携带偷渡物资较容易，既然此地生存不易，回广州进厂又无希望，但却有这么好的偷渡地利，不久小小年纪的她便萌生了逃往香港寻找新生活的心。她不仅自己逃，后来她还利用当地的地利，协助很多广州的知青逃港，成了令人敬重的好人。

1969年4月，因为不断的上诉，当局终于相信当年年纪小小的阿扬不是特务，被囚禁了年半的阿扬被释放了，农场还补发了他年半的工资，他拿着这几百块钱，立即请场里所有的“好兄弟”大吃了一顿，然后离开农场返回广州，回到广州后立即筹备“夜奔”，而阿秀得知二哥被释已返回广州，立即经惠州赶返与二哥相会。兄妹重见后，经过商讨，都一至认为逃到香港是他俩的唯一出路。由于四叔是党员，在株连政策下必然会反对阿秀偷渡，故此阿秀从此不再投靠他，而改为投靠舅舅，舅舅是广州钢铁厂工人，也有儿女下乡，知道知青的苦况，因而支持他两兄妹“起锚”。至于阿扬则依旧到处流浪，四海为家，有一次住在东山的外婆家时遇上查户口，他连忙爬树翻墙逃走。

为了令不会游泳的阿秀能成功游过大鹏湾，二哥对四妹展开了特训。首先在广州为数不多的几个泳池里教她基本动作，阿秀人本就聪明，加上有一远大目标，所以特别刻苦，很快她就学会了游泳。待到阿秀能在泳池里游到几百米，二哥阿扬就把四妹带到珠江里去实战，像当年立心要“起锚”的知青一样，到珠江里去把自己锻鍊成“浪里白条”。曾经数次二哥带着四妹从广州游到石门，经过几个月的特训，四妹也成了“浪里白条”，二哥的耐心细致的教导并没有白费，想不到日后在海里救他一命竟然是四妹。阿秀回到生产队后，由于那里邻近东江，所以经常到东江游泳，日积月累她的体力更强，泳技更加精进，为日后“起锚”准备好条件。

1969年8月，阿扬在广州越秀山百步梯进行体能训练时，认识了一个名叫“刁飞”的人，那“刁飞”自称是宝安县镇隆人，熟悉宝安县边境情况，现因犯了事流落广州，也急需逃往香港，二人一拍即合，立即结伴起行。首先他俩将吹气胶枕，指南针及钱兴？粮票交给阿秀，阿秀则提前几天回去，并按约定的时间为他俩准备干粮。几天后阿扬与“刁飞”空身来到阿秀下放的小山村，由于是亲兄妹的关系故没人怀疑，阿秀招呼他俩吃了晚饭，天黑了才拿出为他们准备的物资，送他俩上山并为他们指明了南逃的方向。这是阿秀第一次帮人“埋堆”及“送堆”，此后她每次回广州都有很多下放别处的知青求她帮忙“埋堆”，她都尽力帮助他们，那些要求帮忙的知青都是二哥阿扬的朋友，阿扬后来在牢里关久了，

认识了很多参与偷渡的失败知青，知道他们都需要人帮助“埋堆”，便把自己的亲妹可以帮忙介绍给他们，而阿秀为人也很有江湖道义，也乐意无偿帮助他们。那时广州到惠州的码头及船检查行李不太严格，冬天宽松些，夏天严格些，男的检查多些，女的较少检查，有也是抽检，阿秀就是利用这一点帮助人。在广州志切偷渡的知青把偷渡所用的物资及钱和粮票交给她，阿秀则把东西分批分开来带，尽量藏在行李中而又不惹人注意，通常一个偷渡团伙所需要的物资如球胆，指南针等为安全计她要分开3—4次来带。她有真实的公社证明，但公社证明不可能常开，一张公社证明她要反覆使用，故此聪明的阿秀学会了涂改日期，而且改得天衣无缝，这样她把物资安全的带回村，从未失过手。回到村后把东西藏起，再到惠州去买糖，面粉及肥猪肉，回到家中先将肥猪肉熬成猪油，再用猪油及糖把面粉炒熟。按照约定的时间把物资及干粮分成若干包，乘半夜携带东西溜出村，把东西藏在山边草丛中，人则在村口路边等待。按照约定时间空身而来“扑堆”的知青一出现，她立即带他们去取回物资及送他们上山。她冒着风险为别人[埋堆]及“送堆”不为钱，纯粹是为了帮人，所得收益就是一些用来佐饭的猪油渣。阿秀此后在1970至1973年利用地利先后多次帮人“埋堆”及“送堆”，帮助了不少人逃亡，苍天有眼最后也令她成功逃港。

阿扬这个昔日的学生先进典型，团支部书记，共产党员，文革造反派的头头终于迈出了“投敌叛党叛国”的第一步。再说阿扬第1次“夜奔”，心情难免紧张，幸亏跟着“刁飞”这个老江湖，两人乘着月色走了一晚，第二天白天“刁飞”仗着熟路继续赶路，中午时分“刁飞”把他带到宝安县镇隆他所在的村子附近，突然遇上一群认识“刁飞”的人，那些人见“刁飞”一出现，就大叫抓住他，于是所有人立刻向他们冲来。好个“刁飞”临危不乱，他指示阿扬逃跑的方向，自己则向相反方向跑，所有人立即都去追“刁飞”，而置阿扬于不顾。原来“刁飞”在当地是个神偷，是个通缉犯，他干的不是一般的偷鸡摸狗，他专偷当地的供销社，合作社及信用社，案情相当严重。好个“刁飞”吸引了所有人都去追他之后，仗着地形熟施展起神偷草上飞轻功，那些想捉他的人跟在后面距离越拉越远，最后只得让他逃之夭夭。阿扬后来在香港重遇了“刁飞”，“刁飞”抵港后亦改邪归正，的确在

香港只要勤劳，又何需作贼。

阿扬第一次“起锚”就遇上这种事，在慌乱中他掉弃了干粮，等到平静下来时他才思考应何去何从，经冷静思考下他决定回去，准备好再来。他循原路重返阿秀处，阿秀见到二哥去而复返，明白到他失败了，尚幸可全身而退。阿秀立即为二哥购买惠州回广州的船票，并亲自送他上船。

回到广州后阿扬继续准备“夜奔”，这时他交了一个女朋友宝珊，宝珊原是平沙农场知青，文革中在广州“红司”是他的女秘书，原本两人感情就很好，这时也想和他一起“夜奔”，但她不会游泳，阿扬只好像训练阿秀一样训练她。宝珊的悟性没有阿秀高，进度很慢，学了个多月才会游一点点。1969年10月，离第一次“夜奔”失败仅两个月，他俩决定趁天气还未冷就上路“夜奔”了。经过两个月的策划，阿扬决定用弃车局走西线，临行前阿扬将地图熟记于心，并为宝珊弄了个救生圈。

出发前阿扬偷了部单车，今天进城的农民工偷单车是为钱，可那时知青偷单车是作为偷渡的交通工具。阿扬把偷到的单车改装了一下，加固了车尾架，然后清晨阿扬用单车尾搭乘着宝珊，两人扮作回城探亲的知青，而今返回生产队的样子，向着东莞踩去。当时阿扬年轻力壮，车尾载着个女孩也骑得飞快，加上刚离广州路上没有遇到盘查，故约中午时分到了东莞的北栅村。到了北栅村阿扬由于熟记了地图，知道前面不远会有一个检查站，当看到路边有一块棺材板作路桥便通过棺材板进入北栅村，踩过北栅村后从另一头出来，这样刚好避开设在北栅公路边的检查站。过了东莞北栅后，不久就进入了宝安县。1969年还未进入知青的逃港最高潮，他俩绕过了一个检查站后顺着公路向南再没有遇到阻挠，骑了一天单车跑了一百多公里，晚上到了西线的沙河白石洲附近，这时他俩掉弃了单车，乘着黑夜越过国防公路，进入了后海湾。

在海滩上阿扬吹涨了救生圈，然后给宝珊套上，拖着她慢慢走下海中。后海湾也是大海，无风也有三尺浪，加上黑夜中略有少许风，浪就更加大了。在黑暗的大海风浪中，宝珊由于游泳本领本来就不高，这时由于恐慌，双手紧抱着救生圈，身体垂直于水中，所学的游

泳技术一点也发挥不出，在水中不能前进，阿扬见此情况只好尽全力顶着风浪去推她。此刻的阿扬由于已踩了一百多公里的单车，体力消耗甚巨，但基于道义与爱情，他没有放弃她，尽全力慢慢的拉她或推她，在后海湾的黑暗中，艰难地一点一点地前进着。在海中宝珊见阿扬为了她游得这么辛苦，如果没有她这个负累，他早就像鱼一样游到对岸去了。宝珊很感动，她对他说一旦成功抵达自由世界，她会立即嫁给他，她会为他生很多孩子。听到这些承诺，阿扬更加拚命了，他要为自己的将来而拚。

可在海中推着一个人前进，那速度实在太慢了，他俩拚搏了一整夜，天明了他们还在水中，不过他们已游过了中间线，离香港流浮山的岸边不远了。这时他们被发现了，一艘大陆蛇口公安炮艇正高速向他们冲来。该炮艇冲到他们附近时突然熄火潜行，慢慢靠近他们。此时阿扬已在水中拚搏了7,8小时，见此情况阿扬更加竭尽全力的推她，正当阿扬脚已触及海底，他们已到了香港这边的岸边，离开岸边1条石壘只有三十多米远，他们被大陆公安炮艇在香港岸边被越境逮捕了，在香港岸边齐胸深的水中，阿扬与宝珊在枪口威胁与竹竿的打击下，被逼爬上了大陆越境执法的炮艇。今日铜锣湾书店的负责人李波被大陆强力部门越境执法抓回大陆，其实这种事在毛泽东时代早已有之。面对大陆炮艇越境抓人，香港水警噤若寒蝉，不敢出来抢人，而那时还没有遣返政策。

本来阿扬发现大陆炮艇向他们冲过来的时候，舍弃宝珊完全有可能在炮艇到来之前独自游上岸，但他在危急关头没有独自逃走，没有舍弃宝珊，因为他相信宝珊对他的爱与承诺是真的，而他对宝珊的爱也是真的。他不想让胆小的宝珊独自被捕，他要陪同她走完整个旅程，他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被捞上甲板并肩而坐，竟然是他俩相处的最后时刻，想不到他俩的缘份这么浅，被捕后因为阿扬囚禁很长，两人从此天各一方，无从相见了。

大陆的炮艇在香港的岸边把他俩“捞汤丸”后，立即高速向蛇口方向驶去，他俩几乎已成功踏足自由世界，只差那么一点点，在炮艇上目睹香港的海岸离他们越来越远，心情十分难受，不知前面有怎么样的命运等着他们。稍后他俩被押送到深圳收容所，一到收容所他俩就被分开了，宝珊入了女仓，阿扬关进男仓，两人从此不再相见，缘份也就断了。



那天宝安各地捕获的人特别多，深圳收容所有人满之患，阿扬的男仓挤满了人，阿扬是被人推挤进去的。阿扬回忆挤拥的程度，牢房别说不能坐，就连站立都觉困难，阿扬这个新来者又是只得一个人，自然被推挤到墙角面对着马桶。窄小的牢房里起码挤进了6,70人，各种气味混杂一起，臭气薰天，中人欲呕。尚幸不断有人进出，深圳收容所是最近边境的一个，自然捕获人最多，被捕获的人很快就根据他们所报的来源地分流出去。阿扬第一次被捕很老实，他报自己来自斗门县的平沙农场，因此几天后被转押到樟木头收容所，在樟木头关押了一段时间后又转送广州沙河收容所，辗转一个月左右才被押到斗门县收容所。

本来人到了斗门县收容所，只要单位有人来领，人很快就会放出去。但阿扬是共产党员，又是群众组织的头目，加上在农场已关了他年多，现在他又成了投敌叛党叛国者，领回场去是一大麻烦，不知如何处理，便干脆不来领他，让阿扬一直在收容所里关着。阿扬在长期的关押中，在收容所这个“偷渡大学”里与各路英雄相交，从中也学到很多偷渡有用的知识，不过这一关也实在太长了，很多人出去了又进来发觉他还在。

再说阿秀自从帮助二哥与“刁飞”“起锚”后，每次回广州都有人来求她帮忙“埋堆”，短短几个月她已帮人起了不少“堆”，有成功也有失败。不久她知道二哥被关押在斗门县收容所，不知要关押多久，便不再等他，这时的她由于经常到东江游泳，早已练成了“浪里白条”，有信心可以横渡大鹏湾，便决定自己先“起锚”去也。1970年夏在回广州的船上，她认识了一个早几年下放同一公社但不同大队的广州人“阿良”，“阿良”在当地有个绰号叫潼湖太公，原因是或许命运所定，由“阿良”训练及带领去偷渡的徒子徒孙，很多人都成功了，他却还留在当地。两人在船上一拍即合，便决定回来后立即结伴“起锚”。阿秀第一次“起锚”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带引，而“阿良”已有8次经验，是一识途老马。而“阿良”失败了多次后，看相的对他说如果这次只带一个女的去可能会成功，所以他便答应与阿秀一起偷渡。由于已为多人“埋堆”，故这次为自己准备，一切都很顺利，1970年8月的一个夜晚，阿秀跟着潼湖太公从下放地附近上了山，开始了她人生中为争取自由的第一次“起锚”。

第一次偷渡对18岁的阿秀来说有很多东西要学，首先夜晚走山路，要懂得白石黑水草两边，意思是夜晚在月光下，白色的是石头，黑色的是水，这时踩着两旁的草头走最安稳。她跟着潼湖太公还学会了用指南针辨别方向以及仅凭星星月亮太阳就能辨别方向。怎样吃干粮，什么水能喝，白天应躲在那里，她都要跟潼湖太公学。她自己还留了个小心眼，就是尽量记住所走过的路，因为她觉得没可能一次成功，认得路的话下次偷渡就容易些。夜晚赶路时为了安全她尽量跟贴潼湖太公，可白天躲藏时孤男寡女为安全计她又要一人躲一个草堆，而且尽量离他远点。第一次偷渡天上经常下雨，虽有雨衣但身上的衣服经常都是湿的，那时穿着湿衣白天躲在草丛里遭受蚊叮虫咬，上蒸下晒，滋味特别难受。

跟着潼湖太公走了约十天，他们爬上了最后一座山峰顶，看到下面的盐田港，两人都很兴奋，躲在草丛中休息，准备晚上下山扑海。在那个时期越近边境的地区军警与民兵巡逻特别严密，这时他们遇到民兵大规模搜山，可能由于他们躲得不够深，他俩被民兵搜出来。这次被捕对阿秀来说不过是上了宝贵的第一课，但对潼湖太公来说已是第9次失败，不知是他命中注定还是相士失灵，连阿秀都帮不了他。此后阿秀再接再厉，终于第五次成功，而潼湖太公后来再逃了几次，前后逃港逃了十几次都不成功，改革开放后只好招工返回广州了。

他俩被捕后先被押到盐田军警，然后转送深圳收容所，阿秀被关进女仓。收容所的女仓虽然没有男仓那样挤逼，但同样的污秽，女犯与男犯一样同样享受4两米一餐，同样要用手抓来吃，不过同样也是偷渡者的大学，女犯们一样互相交流偷渡的经验。阿秀在深圳关了几天，再转到樟木头收容所，后再转移到惠州收容所，在各个收容所里，她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也学到很多偷渡有用的知识。约一个月后她被送回公社，由于是初犯，加上这等事在当地司空见惯，公社也不管她，就让她立即返回生产队。

在生产队待不了几天，她就立即返回广州舅舅处了，这时二哥还未放出来，幸亏舅舅理解她，支持她，她在舅舅处才可调养好身心，准备再次出发。由于她以前帮过很多人，故这次她失败了要重新组班“起锚”很容易，很多男知青都愿意与她结伴同行，很快一个三

男一女以她为核心的新团伙就组成了。和已往一样由她利用地利先把物资带回村去并准备好干粮，三个男知青到时空身来找到她就行了。1970年10月的一个夜晚，阿秀与三个护花使开始了第二次“起锚”。这三个男知青把阿秀夹在中间，很多时都争相为她背行李，而阿秀则利用从潼湖太公处学到的偷渡知识帮助他们，每遇到前路不明都靠阿秀来决定，而聪明的阿秀往往都会把大家带到她和潼湖太公走过的路上来。

就这样她沿着上次走过的路，经过十天左右的夜奔，她把大家带到了望到大鹏湾盐田港的山头上。可能由于他们的运气未到，加上地处边境防守很严，在那里他们再次遇到民兵，四人没有反抗，没有逃跑，乖乖的就范，被民兵一网成擒。被捕后的阿秀像上次一样，先是被送进深圳收容所女仓，辗转十几天后她被押回了潼湖公社社部。由于她已是第二次偷渡，所以公社干部这次没有立刻放她，而是把她关在社部办学习班。一般知青进了学习班都要写思想检查，交代问题，可阿秀是只有小学4年级文化程度，是文化程度最低的知青，或者不应算作知青，公社干部也知道这一点，故此不要阿秀天天作文，只要她每天到附近的山上去割草。阿秀也乐得留在社部，一来割草是轻工，况且割多割少没人管，又可在山上舒展筋骨，呼吸新鲜空气，调整一下再次失败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二来在学习班里有两餐饱饭吃，如果放回生产队，拚死拚活干一天也只得8分钱，这点钱连买米都不够。学习班逗留了两个月，公社终归要把她放回生产队，于是1971年初阿秀立即返回广州，在舅舅处等待二哥的消息。

再说阿扬由于农场故意不来领他，看到很多比他迟进来的人都走了，有些甚至二进宫，三进宫的都走了，可他还留在收容所里，关得久了自然就产生了逃狱的念头。一天放风的时候他捡到一枚铁钉，从此每天深夜他就用这枚铁钉在自己的床底下挖砖缝。同牢房的卒友都知道他在干什么，有的给他放哨，有的躺到他的床上去给他打掩护，白天就一齐把刮下来的灰弄出去。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阿扬挖了几个月，1970年底的一个深夜，他终于成功了，阿扬第一个从挖开的洞口钻出来，这一夜同一牢房的60多人全都经那个墙洞安全逃跑了。

真个是“打开玉笼飞彩凤，脱却金锁走蛟龙”，被囚超过1年的阿扬一旦逃离了斗门收容所，便立即乘着夜色向北，也就是向广州的方向急奔。在这年多囚禁中，他认识了很多这条路上的知青，很多都成了好朋友。阿扬先到附近的知青点找到相熟的知青朋友，那些人见到他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现急需帮忙，都尽力帮助他。招呼他吃睡，给他弄证明，筹钱和粮票给他，最后还陪阿扬到下一个知青点去。这样阿扬一个个知青点的向北移动，每个知青点都停留玩个3,5天，经过个多月才返抵广州。1971年春节前他见到了四妹阿秀，兄妹两都经历了不同的劫难，这次相见恍如隔世。当下四妹阿秀对二哥说，既然要走就走东线，从我那里出发容易，东线我已走过两次路熟。兄妹两在舅舅家相议过后，决定过了年后第三版“起锚”从阿秀处出发走东线，准备游过大鹏湾，他们估计错误，选择了错误的出发时间。阿扬由于曾经在10月份游过后海湾，以为4月的大鹏湾会和10月的后海湾差不多，殊不知4月的大鹏湾环境要比10月的后海湾严苛很多，他们不知道这次偷渡对他们来说是个死亡之旅。

这次阿扬找到两个好朋友一起偷渡，一个叫黄庆龄，是他广州12中的同学，又一齐下放平沙农场，文革中又是同一造反组织，是铁杆的兄弟。另一个叫黎坚，是阿扬文革中驻守广州的造反派好兄弟。阿扬今天有点后悔的说，如果知道这次行动会失去两个好朋友，他宁愿不去或至少不叫他俩去。

1971年春节过后，他们这个三男一女的偷渡团伙组成了，偷渡方法和路线基本上按照阿秀所用过的一样。三月底阿秀先把物资带回去，再为每人准备十斤干粮，这些工作她干多了，所以这次“埋堆”干起来驾轻就熟。准备好后按照约定时间去把空身而来探她的三人接到，在她处饱餐一顿后半夜阿秀就领他们上了山。由于阿秀已循着这条路走过两次，已有相当经验，故三个男的夜间虽然保护她，把她夹在中间走，但实际起指挥作用的却是阿秀，阿秀也不负所托始终没有领错方向，一行人稳稳的缓慢的在山野间行走，慢慢的接近他们这次的死亡之海——大鹏湾。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当年偷渡无论准备得如何充份，总会有意料之外的

事发生，为偷渡增加了难度和变量。出发两天后，他们在通过东莞的秋长平原时，白天正要找地方躲藏时，突然发现在一个不太高的小山岗上有两条不知挖于何时，发生于那次战争的战壕。他们先躲在较低的一条战壕里，后来发现有人向山岗上走来，这条战壕光秃秃的很易被发现，便立即转移到较高的长满草的战壕去。匆忙转移中他们遗下了两份干粮在下面的战壕里，来的人是一队小学生，这群小学生在第一条战壕里捡到两袋共重十几斤的炒面粉，在那个年代拾获这么多干粮，那些小学生如同天赐礼物一样，不再往上走，高高兴兴的拿着捡到的炒面粉回家去了。对于阿扬他们来说骤然失去一半干粮，如果继续前进，那就要四个人分享两个人的粮食，那就意味着他们粮食不足，而3月底农作物还没有长成，野外没有什么可吃的，他们将会挨饿。然而此时他们雄心勃勃，他们有信心克服这困难，谁也没有打退堂鼓，继续向死亡之海走去。

真个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两天后他们进入了宝安县的山区，清晨他们趟过一条小河后，就在河边找了个草丛躲起来。接近中午的时候，他们发觉河对面出现了一个持枪民兵和一条狗。那条狗闻到河对岸有陌生人的气味，立即跳进河里，转瞬间来到了他们面前，并且不停的叫，那民兵听到狗在这边叫，便准备挽高裤管过河来一看究竟。面对这条汪汪叫的狗，他们尝试把带来的腊肠腊肉拿出来喂它，这条狗有东西吃时不叫，吃完了又叫，他们只好把带来的腊肠腊肉全都拿出来喂了狗。那狗吃饱了就跑回去了，而那持枪民兵已到了河中，见狗回来了也就不再过河，退回对岸去了。那些腊肠腊肉是他们为了渡海增强体力而准备的，现在全喂了狗，那真是一条要他们命的狗。面对食物不断丢失，出门诸事不顺，种种不良预兆都向他们预警着此行会有凶险，此时如果他们头脑冷静些应该考虑撤退的问题，然而此时他们仍然认为只要有决心定可克服任何困难，箭已离弦唯有一放到底。今天的阿扬说如果知道结果是这样，他希望狗继续叫，而那民兵会发现及逮捕他们。

他们继续日宿夜行，由于粮食不够，大家唯有省着吃，很多时都饿着肚子上路，因而体力下降，影响了进度。出发十日后，时已4月初，如果按照正常进度他们应该到海边了，但他们这时离海边还有一段距离。不管他们如何省着吃，但两个人的份量四个人吃如何够

吃，这时他们开始断粮了。第十日的白天他们躲在草丛中什么东西都没有吃，饿了一整天，但晚上他们继续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南行。午夜时分他们不知如何闯进一个墓地里，那是一个三、四十米高的一个小山头，在月色中他们看到墓地中央有一个特大的墓，周围有很多较小的墓围着该大墓，这显然是宝安县某一大氏族开村的墓葬群。4人在夜间进入了这个墓地后，不管怎样转，在墓地转了两三个小时，始终还是转回那个中央大墓里。可能是该墓的主人知道这4人此行合该有大难，想救他们故此想把他们困在墓地里。他们见转来转去都转不出去，便心生恐惧，知道是鬼神作怪而不知人家其实是救他们。4人这时齐聚在大墓前，把身上的钱和硬币都拿出来放在大墓前，并向该大墓打恭作揖，口中念念有词，祈求墓主保佑。阿扬这个曾经的马列信徒，共产党员，无神论兼辩证唯物主义者这时更向该墓跪下，冬冬的叩了几个响头，也许由于他叩了几个头，墓主感其诚，日后保他大难不死。说也奇怪，就在阿扬叩完头之后，四人同时听到一个女子“唉”的叹了一口气，那声音极像一个受伤的女知青的叹息声，那声音时大时小，时远时近，似在要引导他们走出墓地。四人于是便跟着那女声走，很快便走出了该墓地，一出了墓地那把女声就实时消失了。可能墓主见他们去意已决，天意难违，救他们不得，就对他们放行了。阿扬事后真的希望那大墓能把他们困到天亮，困到令他们被捕。

他们饿着肚子在阿秀的带引下向南又走了两天，终于登上了最后一个山头，看到了大鹏湾。然而这时他们已饿了三天，饥饿的感觉很难受，这时有人提议为安全计不如回去。不过这意见没人接受，不知是谁说要投降你自己去，下面就有一条村。由于没人附和，这意见只好作罢，阿扬真后悔没有附和，以致最终失去两位好朋友，自己也几乎没命。天黑后他们开始拖着饥饿与疲惫的身躯下山，注定他们命该如此，本来防守严密的地方没有遇到任何军警，竟然让他们很顺利的就到达海边。一接触到海水，阿扬就觉得自己估计错了，4月的大鹏湾的海水真的比10月的后海湾冷很多。本来一下水感觉水太冷，加上饥饿与疲劳，勉强渡海会有生命危险，但绝大多数人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到达海边，又有几人理智的肯在海边投降，加上绝大多数人逃港都早已将生死置于度外，有机会到达海边为前途与自由

肯定会用生命来赌一赌。很多人都以为凭青春的生命之火，投奔自由的决心可战胜无情的大海，殊不知大自然的威力令人难以战胜，不少投奔自由的知青都命陨于大鹏湾。阿扬等4人一接触到海水，稍为犹豫了一下，谁也没有后退，慢慢的走下海滩，决心用生命来为自由赌一赌。

他们抛弃了多余的东西，套上了救生圈，在黑暗中扑入冰凉的海水中，各自奋力游向看不见的遥远的彼岸。阿扬曾经游过后海湾，算是比较有经验，其余三人都是第一次下海，因此阿扬吩咐大家尽量围绕着他来游，不要游散，彼此好有个照应。阿秀虽已练成了“浪里白条”，但毕竟第一次下海，面对大鹏湾的风浪和看不见的对岸，心中很害怕，她唯有紧紧的靠着有渡海经验的二哥来游。刚开始游的时候，四人都不时在海中互相呼叫，你们在那里？以便修正大家的距离。他们4人与海水搏斗了三个小时后，估计他们已到了大鹏湾的中央，可黑暗中他们全然不知道离岸还有多远。大鹏湾实在太阔了，4月的海水实在太冷了，如果他们不是又饿又累，而是吃饱了才下海，或有成功的可能，又或者他们是7、8月渡海，那时海水较暖，在饥饿状态下也有成功的可能。在冰凉海水中最先支持不住的是阿扬，搏斗了几个小时后，他终于在海上冷晕了，幸得身上系着个救生圈才得以浮在水上。女性由于皮下脂肪较厚，因此在同样的水温下可支持久些，阿秀虽然又饿又冷，但还可支持得住。阿秀由于挨着二哥来游，这时她先听到二哥喊冻，便马上在水中把毛衣脱下来给他套上，继而见他双眼翻白，全身起鸡皮疙瘩，四肢僵硬昏迷了，便赶紧游过去扶着他，不断的摇晃他和鼓励他要支持下去。这时阿秀还听到黎坚、黄庆龄呼唤她的声音：“阿秀，妳在那里？”，凭声音判断他们就在附近，因为她还听到他俩的呛水声。阿秀知道他俩也需要帮助，但一来黑暗中看不见他俩在何处，二来她还要照顾二哥已无能为力了。

阿秀是最后一个听到他俩声音的人，因为阿扬当时已昏迷什么也听不到。阿秀听到他俩的叫声越来越弱，以致后来除了风浪声外什么都听不到了，这时阿秀估计他俩遇难了。霎时间这个4人的团队只剩下阿秀和昏迷了的阿扬，在黑暗而风浪颇大的大鹏湾中，阿秀向前望，前面一片漆黑，不知海岸还有多远，向后望则还可以看到盐田港几点稀疏的灯光，

向前游不知要游多长时间，但向回游则可估计到约需三个小时。阿秀不知昏迷了的二哥在冷水中还可以支撑多久，情急之下为了二哥的生命她决定拖着 he 往回游。她不知此时其实他们已在海中央，向前或向后需时都差不多，如果她选择向前，则后来会少受很多折磨。阿秀游出来时是一个人游，现在要拖着一个人游回去，又冷又饿又累加上又有风浪，她感到比游出来辛苦很多，但她知道那是她的亲哥，是她的亲人，只要有一丝希望她都不会放弃。阿秀在海里尽全力拉阿扬，一边还要大声的对 he 呼喊，希望能把 he 喊醒，她要不停的鼓励 he，希望 he 能坚持活下来，为此 he 喝了不少海水。终于经过几个小时的拚搏，筋疲力竭的阿秀在黎明时把二哥拖上盐田港的海滩。阿秀在海滩上喘气，面对昏迷了的二哥一筹莫展，这时走来了几个当地农民，其中一个摸了摸阿扬的鼻孔说，还有气可救。于是几个人立刻去找来一大堆干草，生起了火堆把阿扬加温，那些农民说昨晚大鹏湾死了很多人。

阿扬在大鹏湾搏斗了几个小时后，终因海水太冷体温流失太多而陷入昏迷，昏迷前 he 觉得自己快死了，他只感到有人拉 he，叫他， he 不想死后埋在不自由的土地上，便叫阿秀把 he 埋在前方沙滩，死也要做自由之鬼，可是由于 he 的舌头冷僵了，发不出声来。 he 也不知自己昏迷了多久，突然 he 觉得脑袋里出现一片白光，白光中最先出现的是 he 已逝世的母亲，然后是他的好朋友黎坚与黄庆龄， he 当时不知 he 俩刚死，然后出现的是 he 想见的人的影像， he 潜意识告诉他这是 he 濒临死亡所产生的幻觉。这幻觉 he 不知维持了多长，突然白光熄灭，不久 he 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 he， he 一睁开眼，发觉自己躺在火堆旁，喊 he 的正是四妹阿秀。

阿扬悠悠甦醒，知道是四妹不顾自己的安危尽力把 he 拉回来，她等同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心中很感激，从此兄妹感情更好。阿扬从阿秀口中得知好友可能已经遇难，心中很难过，本来还存有一丝希望，希望 he 俩能平安抵港，但事后从没收到任何有关 he 俩的消息，足见两人当晚已死于大鹏湾，阿秀听到的声音是 he 俩最后的呼喊。那些农民见 he 已甦醒，便把这两个投敌叛党叛国份子押送到盐田军营，稍后 he 俩再被转送深圳收容所。

在深圳收容所两兄妹被分开关押，稍后阿扬再一次与死神擦身而过。被送进深圳收容所



的傍晚，天下着滂沱大雨，突然十几个身披雨衣手持冲锋枪的解放军杀气腾腾的冲了进来，后面还有几个持着手枪的公安武警押着一个淋得像落汤鸡似偷渡者进来。这些人一进来就喝令收容所里被关押的几百个男犯出到天井里，命令这几百人在雨中双手抱着头蹲下，不准偷看，一个持枪公安押着这个刚被捕者来认人。阿扬冷眼偷窥，只见这个知青模样的刚被捕者已经吓得全身发抖，已口不能言。公安用枪押着他在人群中转了转，他在一个人身后稍停了一下，什么也没说，一个解放军立刻走过来掀起那人的头来看了看，就把他拉出去了。转眼间那刚被捕者来到阿扬身后哆嗦着停了一下，阿扬心想自己都不认识他，他为何要来害我，心脏突然卜卜乱跳，惊恐万分，几乎崩溃，刚从阎王殿逃出来马上又要进鬼门关，难道不死于海中而要死于此？幸好持枪的公安却掀起他旁边的人看了看就把他拉出去，死神就是再次如此之近接近。那批人从收容所胡乱抓了两人后就立即离开，还没等蹲着的人站起来，所有的人都听到收容所门外响了4响枪声，3个人如此就立即被枪毙了。

众人惊魂未定，天上下的暴雨很快就将门外的血迹冲刷干净，但留在这批投敌叛国份子脑里的记忆永远冲洗不了。回到挤逼的牢房之后，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肯定这班人被解放军发现后有人有反抗，以致令到解放军有伤亡，所以他们会杀人来泄愤。但大部份人却不同意这么说，认为这帮人见了解放军就立即逃跑，军人在暴雨中追赶而出了意外而已。的确当年偷渡人士遇到民兵或解放军，能跑则跑，跑不了就束手就擒，遇到民兵还好些，因为他们自己有很多亲朋逃过去了，有的自己也想跑，民兵一般不会打人，有些甚至会放人及指路。偷渡者最怕遇到解放军，因为那是一群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脑残，他们对捉到的投敌叛国者特别痛恨。军人逮到偷渡者后，通常都会用枪托把人打倒，尤其是那些个子长得比较高大的，把人打伤了他们才感觉安全，简直禽兽不如。被打者不但不敢反抗，还要表现相当驯服，因为他们知道稍一不驯，就会被解放军开枪击毙。笔者有一朋友，当年在海滩上被捕，解放军冲过来，先用枪托把他打倒，再叫狼狗扑上去咬，那狼狗把那人的衣服全撕碎，连裤子都撕成碎布条，那人就是一动也不敢动，当军人喝令他站起来时他忍着巨痛也要站起来，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站不起来军人随时会给他一枪。笔者采访当年偷

渡事多年，还没有发现有一起反抗事件。当晚还有人说那两个被揪出来枪毙的人可能是冤枉的，他们跟被捕后来认人者未必是同伙，他的同伙怎么会在他被捕前就被关进来，肯定还在野外。阿扬真的庆幸自己福大命大，差一点就做了冤死鬼。当年是个无法无天的时代，军警可以不经审判就可以随意杀人，今天我们这方面已经有人站出来说出这些惨绝人寰血腥的往事，那些当年的刽子手，收容所的管教们，你们可有勇气本着良心承认自己的罪行。

在深圳收容所关押了几天后，阿扬由于来自斗门县的国营平沙农场，故此和上次一样先押送到樟木头收容所，在那里关押一段时间后再转到广州沙家滨“沙河收容所”。在沙河收容所里，几百人关在一个大仓里，环境相当挤逼污秽，经常有人打架，但更多是互相交流经验。进仓的第一天深夜，阿扬睡不着，便低声哼起了文革中和人共创的“夜奔”，料不到经过几年，“夜奔”一曲竟然成为流行于偷渡知青中的名曲，他一唱立即引起共鸣，先是几十人跟唱，有不少人还敲击饭碗及杂物制造和声伴奏，最后全仓几百人都低声齐唱，几百人的低声合唱汇聚成时代的强音，这歌声抒发着偷渡者的情感，在夜空中向四周散发。这歌声传到了女仓，女仓传来叫好声及叫继续唱教她们。这歌声也惊动了收容所的管教，一名管教用手中的木棍敲着窗框大声叫：“唱什么！不准唱！我们又建了一个大仓装你们！来一个装一个！有多少装多少！”，广州沙河收容所全盛时期共有5个大仓，可同时收押几千人。听到管教这样说，仓内顿时静下来，寂静中突然一名广州仔故意大声用普通话回答他：“我们有的是屁股！”，这滑稽的回答立刻引起全仓人的哄然大笑，令到那管教悻悻然无可奈何，的确这回答有点像当年共产党人愿把国民党的牢底坐穿的味道。

阿扬在“沙家滨”关了一段时间后，最终又转回斗门县收容所，由于他曾在此逃狱，故收容所加强了对他的监管，平沙农场又不来领他，他又开始了比别的偷渡者长得多的监禁。至于阿秀碾转经过几个收容所后，最终被送回潼湖公社，像上次一样，她要留在社部学习班，白天要去割草，割了两个月草后才放她。经过了第三次“起锚”二哥险死还生之后，她对二哥极不放心，故不论二哥关押多久，她都要等二哥放出来再算。在等待期间不少男知青邀约她同行，她都婉拒了，只是默默无偿地为他们“埋堆”及“送堆”。

人怕出名猪怕壮，阿扬偷渡了三次，其中一次几乎成功，又成功逃过狱，关押时间又最长，偷渡经验很丰富，人虽然在牢里，但名声却在外头。不少人经常到斗门县收容所来拜他这个山“探监”，给他送来好烟及食物，这些来拜山者很多他都不认识，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这些人来拜山都有一个目的，就是结识这个传奇人物，从他处取得偷渡的资料和经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他放出来后，下一次“起锚”能带上自己或自己的亲人。那时当局也知道人们为什么来拜山“探监”，所以不准拜山，拜山会很危险。收容所一般建在偏远的地方，四周没有民房，来拜山者在放风的时候，隔着围墙高叫某人的名字，然后把东西抛进去，希望以此来建立关系，方便日后偷渡，当局抓到来拜山者一律囚禁三个月，然而为了能埋堆而来者大不乏人，可见当年埋堆之困难。有一个经常来拜他的三十几岁的来自佛山男人为了结识阿扬而甘愿被抓进来，阿扬放出来后第四，五次“起锚”都带上那人的亲姪女，最后成功了并娶了她。那个佛山人4兄弟后来偷渡，一人失败，一人死亡，两人成功。在斗门县收容所关押了一年，管教见经常有人来拜他，怕他再次领头逃狱，便把他强行送回平沙农场，谁知送回农场后没人管这事，阿扬把握机会在朋友的帮助下迅速逃返广州。

1972年夏阿扬在广州认识了那个常来拜他的人的姪女燕銮，阿扬之前的女朋友宝珊则因为他坐牢时间太长而失去了联络，这个燕銮长得比宝珊还要漂亮，阿扬对她一见倾心。燕銮也是个长期倒流回城的知青，也是个急切需要周围找人搭路逃港的人，这次他通过叔叔认识了阿扬，相方很快就谈到偷渡的事。燕銮早前和两个朋友认识了一个蛇头，那蛇头要收三人共500元，保证为他们准备一切及送他们到边界，他们已交了钱，燕銮请阿扬一起去听蛇头说话。那时急切需求帮忙偷渡的人多，故那些骗财的蛇头也应运而生，志切偷渡者一不小心很容易坠入陷阱，导致人财两失。阿扬陪燕銮去听完蛇头讲话后对她说那个蛇头不可靠，这可能是个骗局。但三人已付款，几天后唯有如期出发先到惠州，在惠州找到蛇头，那蛇头什么也没为他们准备，却对他们说现时风声很紧，宝安县已戒严，周围很多军警，已无法到达边界，叫他们先行回去。他们知道遇到骗子，金钱无法追回，无可奈

何下幸好能全身而退，安全返回广州。阿扬知道后对燕銮说，妳还是跟我一起走吧，请妳相信我，我一定尽力把妳带到香港。

当年的阿扬长得风流倜傥，外表不凡，加上他这样说，燕銮便也芳心暗许，从此便跟定了他。阿秀见二哥有了新女朋友，且比前一个更美，有可能将来是她的二嫂，心中也为二哥高兴。很快一个三男二女的偷渡团伙就在广州组成了，阿扬两兄妹加上燕銮，还有两个阿扬关在斗门收容所认识的男知青。阿扬汲取了上次4月份海水太冷的教训，选择了8月份海水较暖时出行。1972年8月阿秀早些时候把物资先带回村里，然后立即为大伙准备干粮。按照约定的时间阿扬四人空身从广州到阿秀下放的小村来探访她。会面后众人在阿秀处饱餐一顿，入夜后各人背起自己的背包，在阿秀的带领下上了山，开始了新的“起锚”。

阿扬两兄妹已是第四次偷渡的老行专，只有燕銮这个女的是第一次，什么经验都没有，胆子又小体力又弱，夜间行走时阿扬处处护着她，经常为她背背包，遇有危险路段还主动牵着她的手走。阿秀对这个未来二嫂也很照顾，不管白天黑夜兄妹俩都陪伴在燕銮左右。在阿秀的正确带引下，一行人走了七、八个夜晚，已经很接近边界了，这时燕銮在夜间行动时不慎脱落了鞋子，怎么找都找不到，一个没经验的女孩子光着脚怎能在夜间走山路，阿扬便毅然脱下自己的鞋子给燕銮穿上，宁可自己光着脚走。阿扬是个重情义的人，当年不肯抛弃宝珊独自逃生，今天又怎会让燕銮的脚受苦。光着脚在野外行走很危险，几天后在过一条小溪的时候，他的脚底给一枚钉螺扎了一下，他当时也不大在意。

当年每逢7、8、9这几个月海水较暖，因此是偷渡的旺季，当局也加强了边境的巡逻。他们走了12个晚上，已经闻到海水的咸味了，这时他们遇到了民兵搜山，也许他们的运气未到，五人之中除了一个这时恰好掉进一条大山坑里，民兵找不到他之外，阿扬等4人全部束手就擒。逃脱的一个日间逃过了民兵追捕，当晚就游过了大鹏湾。

阿扬兄妹与燕銮等4人在将到海边时被民兵擒住，民兵很快就把他们押到盐田港军营。接收他们的军官认得阿秀，因她已第4次被捕，大家都是老相识，在四下无人时，那军官很温和的问阿秀肚子饿不饿？阿秀老实回答很饿，问归问时答归答，反正不会有食物给吃。

一有外人进来，那军官马上变脸，马上声色俱厉地审问她，好一个两面派。日间太阳越高，军营里各路被捕的越来越多，营房越来越热闹，军队怕有人逃跑，于是命令一大群的被捕者双手抱着头蹲在地上。阿秀由于第4次被捕，一个牵着狼狗的士兵认出了她，那脑残先逼令阿秀脱掉鞋子，然后高声喝问她“这次又带了多少人来！”，阿秀嗫嚅着没有回答，那个泯灭了人性的脑残见她不答，便挥起手中的鞭子一鞭向阿秀打来。旁边那个一同被捕的男知青突然挺身而出，替阿秀挨了，那脑残士兵见有人舍身救美，更加怒气冲冲连打几鞭，那男知青也连挡几鞭，可怜那知青着鞭处衣衫立破，血痕即现。那脑残解放军见打不着阿秀，便放开狼狗叫它来咬阿秀，可能畜生比脑残更有人性，或者是那军人命令下得不够坚决，加上阿秀没有一点反抗的动作，那狼狗迟疑着没有咬阿秀。稍后所有被捕者被押送深圳收容所，男的双手捆绑串成一串，女的一般不绑，但阿秀像男的一样绑起，似乎还更用力些，以致到达深圳收容所时，阿秀双手都肿了。

很快他们就被送到深圳收容所，阿秀和燕銮被关进女仓，燕銮第一次进格仔，自然什么都不惯，阿秀第四进宫，自然经验丰富。她处处护着燕銮，不让人欺负她，还教给燕銮很多蹲格仔的经验，由于有阿秀的陪伴，燕銮才能很快适应女仓的生活，她觉得跟着阿秀两兄妹偷渡有安全感，所以后来不管怎样她都要跟他两兄妹一齐走。

那时深圳收容所有一惩罚犯人的做法，本人在“起锚后补16”里曾经提过，那时人已吃不饱，但管教们每天早上还要在押犯绕着空地慢跑半小时，然后围坐一起背“老三篇”，谁要背不出，管教就会狠狠地一竹棍打过来，为了少挨打大家都往中间挤，大圈仔“广州仔”由于人多势众，所以通常都会占据中间位置。那些管教们明知这些投敌叛国者对毛泽东思想这病毒早已免疫，但还要对他们强行洗脑，大家都明白不过是演戏而已。阿秀进来的第二天早上，跑完步后大家围坐一起，把中间的位置让给阿秀、燕銮等广州来的女友，男知青们不用言语自然而然地把女性保护起来，从中也可见逃港者人性光辉的一面。

由于阿秀、燕銮都是知青，所以很快就被送回各自所属的公社。燕銮的公社不管她，很快她就返回广州，阿秀则要留在社部割草，两个月后才返回广州。阿扬这次学乖了，他

不再报平沙农场，报的是一个这方面管理宽松的公社。当把他押到他所报的公社后，押解员一走，这个公社发觉他不是他们的人，也没人理他，他就趁机逃走了。这次因为他报了流，所以关押时间很短，如果他不报流，关的时间稍长一些，他就会没命了。

阿扬返回广州外婆处不久，发低烧经久不退，继而全身浮肿，越来越虚弱。这时他文革初长驻广州沙面总部认识的一个高干子弟，也有份参与创作“夜奔”的，知道阿扬四次“夜奔”都铩羽而归，特意来探访他。见到他这模样，大吃一惊，连忙用车以自己高干父亲的名义把阿扬送到当时医疗条件较好的流花湖畔广州陆军医院，阿扬一入院不久人就昏迷了。在昏迷中阿扬有好像上次在大鹏湾中濒死的感觉，他经常脑中充满白光，白光中他死去的母亲，死去的朋友黎坚、黄庆龄等的影像经常出现，他们都好像有话要对阿扬说。由于他是以朋友高干父亲的名义送入来的，陆军医院的医生对他进行全力抢救，终于阿扬昏迷了11天后甦醒。醒来后医生对他说，他感染了一种叫“勾端螺旋菌”的细菌，这种细菌很厉害，医院里同一时期送进来的十几个军人，他们在宝安县进行野外军演时，感染了这种细菌，没有一个能活下来，他能甦醒是个奇迹。医生还告诉他这种菌主要寄宿于钉螺中，阿扬想起偷渡中光着脚在山溪中被钉螺扎了一下，知道自己是怎样被感染到的了。阿扬这次在陆军医院住了40多天才能出院，当然一切医疗费用都由那朋友的高干父亲报销。

出院后阿扬身体比以前差了，为此他要思考新的偷渡方法。他与阿秀及燕銮认真总结了之前失败的经验，认为7—8月出发沿途军警民兵防守严密，容易被捕，且要游过大鹏湾病后初愈的阿扬恐力有未逮，认为还是3—4月出发，采用“橡皮艇”为好。过完年不久的3—4月，天气还未热，故此防守较松，较容易下海，而采用当时流行的自制橡皮艇则较游泳安全得多。1972年底的一个深夜，阿扬潜进了广州第二人民医院的仓库，盗取了4张医用胶布，或许他时来运到，用自行车推着一大捆胶床单从仓库出来一直都没人发现。一切准备好后，阿扬将自己的计划写信用暗语通知时在下放地的阿秀，阿秀收到信后立即回到广州舅舅家。1973年初的几个深夜，阿扬与舅舅及一个会做橡皮艇的朋友在舅舅家制作橡皮艇，他们先用胶水将胶布贴合，然后用铁鎚把贴合处敲紧，深夜敲打自然会有响声，引

人怀疑，这时阿秀就在楼下放哨，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停工收藏。这样几个人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终于制成了一艘廿几磅重有4个气筒较大的橡皮艇。橡皮艇制成后阿扬于深夜拿到广州近郊的黄婆洞水库去试水，后来又拿到阿秀下放地的东江去试，试验成功才放心使用。

1973年初，阿扬着手组班偷渡，由于他要照顾燕銮，加上自己病后体力差了，而所制成的橡皮艇较大较重，他要求新加入的人负责沿途背负这橡皮艇。这时他在广州的组班遇到了困难，他所希望的人都不愿埋他这个堆，一来不想全程背负这重东西，二来阿扬已“夜奔”4次，有两人死亡，他自己也有两次几乎死去，被人认为黑气太重，不宜沾边，他不知不觉中已成了广州的“潼湖太公”。既然阿扬在广州组不到班，那阿秀便在惠州那边负起这重责，经过她的努力，终于找到一名体格健硕的惠州知青愿埋他们这个堆，沿途负责背负橡皮艇。1973年初春节前阿秀先把橡皮艇藏于行李中，阿扬与舅舅及大哥“硕桐”随行一起坐船到阿秀下放的小村。大哥“硕桐”从海南岛回来探亲，他要一看四妹下放的地方。时值冬天检查松些，加上橡皮艇藏于阿秀的行李中，又有几个男的从旁打掩护，故此阿秀很轻易的通过码头和轮船把橡皮艇带回村去。舅舅与两位兄长这次在阿秀处住了三天，其间阿扬与阿秀费尽唇舌苦劝大哥“硕桐”这次跟他们俩一齐走，无奈大哥有所顾虑不敢走，阿扬唯有把自己的关系网介绍给大哥，希望他以后用得着。众人把橡皮艇送到后住了几天后离开，阿秀再像以往一样为大家准备充足的干粮。阿扬与燕銮过完年后扮成一对恋人前来探望阿秀，兄嫂探妹正常事，何况村民已见过阿扬几次。会合了那个惠州知青后，1973年农历正月初七深夜，由阿秀带头，阿扬牵着燕銮，惠州知青背起橡皮艇，一行人展开了投奔自由的新旅程。

这次偷渡他们像以前一样，傍晚和黎明就急行军，夜间能看到路就慢慢走，看不见就停下来，白天就找个草木茂盛的堆躲起来，吸取以前的教训，白天他们尽量躲在人迹罕至的地方。那个时节春雨绵绵，众人衣服很少有干的时候，山路又湿又滑，夜间又冷，辛苦非常，但大家都有颗投奔自由炽热的心，什么困难也难他们不倒。这次他们准备充份，除了干粮充足外，他们还带了腊肠腊肉以增强体力，此外还带了一个酒精炉沿途烧水喝，为了

划橡皮艇每人还带了一块自制的像乒乓球板似的木桨。这条路阿扬已走过，故此由他披荆斩棘做开路先锋，阿秀也算识途老马伴着第二次上路的燕銮紧随其后，惠州知青则像沙和尚那样背负着橡皮艇殿后。这条路他兄妹俩都走过几次，故此除了有时会绕道走远一些外，基本方向没有错。他们比唐三藏取西经还要艰难，唐三藏遇到的不过是妖魔鬼怪，他们却要面对全副武装的军队及民兵，唐三藏日间走路，他们夜间爬山涉水，唐三藏取经是全男班，他们中一半是女娇娥。唐三藏向西走取的是佛经，他们向南走取的是自由之经。这次由于他们准备充分，加上没有遇上意外，故没有挨饿。3月果然是防守较松懈的月份，他们这一群取“南经”的人这次交上了好运气，沿途都没有遇到军警或民兵，辛苦了十个夜晚后，他们又来到了可俯视大鹏湾盐田区的最后一个山头。

白天休息了一天，天一黑他们就下山，几个小时后平安到达海滩，在海滩上他们一齐把橡皮艇吹涨，然后推下海，各人先后爬上艇。这次他们好运到了极点，他们摸黑竟然摸到了盐田渔民大队的渔船旁边，在渔船旁做了那么多事都竟无人发觉，幸运他们是在渔船旁做，如果在远离渔船的海滩有可能遇到巡逻的解放军。他们全然不知道自己闯进了盐田渔民大队的基地，直到他们上了橡皮艇才发觉橡皮艇要在渔船群中穿行。合该他们全都转好运了，渔船上的人说话他们都听得一清二楚，一个小孩夜间起来撒尿几乎撒到橡皮艇，离得这么近但好运一来就是没被人发现。他们屏息静气轻轻的划动木桨，等到橡皮艇慢慢的漂出渔船群，他们才发力加快速度。他们的橡皮艇用4块胶布造成，实在大了点，可以乘坐8个人，现在只有4人少了点，他们第一次划橡皮艇没有经验，大家发力不匀，但好运来时橡皮艇旋转着仍向海中漂去。

他们努力划船，橡皮艇旋转着向遥远的彼岸漂去，此情此景跟“夜奔”多么的相像，与“夜奔”歌词不同的是阿扬并没有和女朋友分离，他现正和女友燕銮一起努力的划动双桨，一齐奔向自由的彼岸。这时成功在望的阿扬不禁低声唱起了“夜奔”，“啊！你汹涌的浪头，请将我抛向远方，我要像你一样翻滚在大海上，我爱在大海颠簸流浪。不怕任何风险，大风浪里永向前！”这低沉的歌声在冷寂的夜空里鼓舞了众人的斗志，3月的大鹏湾夜



间风浪不小，溅上艇的海水把他们的衣服打湿了，他们觉得海水真冷，幸亏在橡皮艇上。他们努力的划动木桨，橡皮艇在波涛起伏中打着转慢慢的漂向对岸，经过几个小时的拚命，或许他们运气好，或许“黎坚，黄庆龄”等一众死于大鹏湾的亡魂护佑着他们，他们成功了，黎明前他们登上了大鹏湾香港这边一个叫鸭洲的小岛，当他们在晨光中从海滩的垃圾判定这小岛属于香港时，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他们感到自由了，欣喜若狂。

天亮后一艘香港水警轮驶过来把他们接走，那时还未有遣返政策，阿扬兄妹终于经过千辛万苦，第五次“夜奔”成功。阿扬携女友一起回到11年前他曾经来过的地方，想起这11年来的际遇和经历，想到死去的两位朋友，心中无限感慨。这一次的成功，另到阿扬摆脱了自己是“黑仔”的心理，他不是第二个“潼湖太公”。此后他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写信告诉大陆的亲朋，不少人循着他的路线和方法获得成功。阿扬所下放的斗门县平沙农场较近澳门，他的不少农友偷渡到澳门，那时澳门有遣返政策，逃到澳门还不算成功，需要在亲友的接应下避开澳警拦截，伺机到香港才算成功。自己成功了的阿扬不忘那些过去共患难的场友，热心助人的他当年曾多次前往澳门接应朋友。按照预计的日子，阿扬会在傍晚时候到达澳门边界的一个坟场，天黑后他就会对着墓碑喊“有没有XXX, 有就出来!” 如果他的朋友平安抵达，又躲在墓碑后，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就会在墓碑后站起来，他用这方法先后接到两个场友，并帮他们到香港。另外在香港边界沙头角，在自己成功后的几年中，收入不多但仍以每个几千元的代价，先后将6个逃港成功但落入蛇头手中的朋友救出。

所有成功逃港人士都知道，抵港之后还有漫漫人生路要走，在这过程中将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挫折，但对经历过偷渡的人来说还有什么困难不可被克服，虽然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比欠缺了天时地利人和，起跑线落后很多，但我们有百折不挠的勇气和努力。阿扬与燕銮抵港后立即同居，不久正式结婚，夫妻俩首先胼手抵足做街边小贩，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卖过。当了两年小贩后，阿扬转到继父的小藤器厂工作，燕銮就到其它工厂做女工。阿扬的继父这时已另娶，并已有了几个子女，阿扬加盟参与藤厂管理，如虎添翼，凭着聪明才智冲天干劲，他令到藤器厂业务蒸蒸日上。九十年代中期其继父移民美国，阿扬这时已是一

个富有管理经验的人才，他转到一间塑料厂担任管理工作，并一干就干到退休。婚后俩人育有两个儿子，现大儿子在港做物流生意，小儿子在美国从事高科技工作。太太燕銮十几年前因病去世，不能和燕銮同偕白首是阿扬最大的遗憾。

至于阿秀先到制衣厂工作，后转到电子厂做女工，1975年美丽聪明的她接受了一个胶袋厂太子爷的追求，成了那间胶袋厂的老板娘。阿秀说别以为当老板娘很风光，其实更辛苦，什么都要做。九十年代胶袋厂因大环境发生变化而歇了业，两夫妻转战台湾从事广东烧味制作，辛辛苦苦拼搏了三年，终因打不开局面而返港，返港后其夫干建筑地盘及装修方面工作以养家。阿秀婚后生了一子一女，现都已工作且相当孝顺父母，阿秀小时候没有，但现在拥有一个温馨完整的家。

至于他俩的大哥“硕桐”下放海南岛，1973年知道两弟妹成功偷渡后，也曾尝试两次“起锚”，但都不成功，1979年随着返城大流返回广州进了厂，后来曾经下海经商但不成功，现在靠几千元退休金过日子。大哥偶尔会到港来探望他俩，三兄妹时而广州，时而香港聚会乐也融融。至于其反革命父亲1979年获平反后，父慈子孝顺的日子也过了几年，但对他这个苦命人来说，这样的好日子实在太短了。

今天阿扬与阿秀两兄妹已和当年的偷渡者一起进入了退休时刻，但当年偷渡的艰辛仍历历在目，经常午夜梦回惊醒。他俩把他们当年“夜奔”的辛酸苦难说出来，目的就是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人，警惕后世。如果我们不警惕，不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在中国落实，过去发生的灾难随时会重临。看看今天的北韩，想想我们的过去就知道普世价值的重要。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他是会很巧妙的重复的，是时候不要脑残下去了。

仅以此文献给黎坚、黄庆龄及所有当年争取自由的亡灵！ ■

2016年11月1日写于香港

**【重要启事】**

本刊从2017年元月起，实行会员制。凡如本刊声明所说，提供本人出生年、教育程度、所在地和职业，并承诺完成下述诸项条件之一者，即有资格成为本刊会员，无偿获得本刊：

一、一年之中至少采访一名文革亲历者，将访谈形成的文字交《记忆》发表。

二、或一年之中至少有一篇来稿为《记忆》采用。

三、或一年之中至少为《记忆》提供一份文革史料（包括日记、笔记、传单、小报等）。

四、或一年之中至少给《记忆》写两次读者来信：或提意见，或提建议，或评文论事，或谈个人感想。字数不限。

五、或以其他方式帮助本刊。■

《记忆》方惜辰 谨启

2016-11-30

**【来信选登】****一、关于会员制的不同意见****1、同意**

方老师的意见是对的。保存历史记忆工作需要更多的人积极参与。回想六年前，我对文革历史还一无所知，但启之和何蜀的邀请使我不得不认真阅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成为进入这个领域的一个关键契机。我想很多人和我以前一样，但可能因为别的一个什么小小契机成为抢救历史记忆的参与者。因此，我很赞同方先生的提议。

《记忆》作者群体的扩大，会带来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尤其在学术规范方面如此，建议编辑组对学术规范提出简要指南，以便访问者和文章作者少走弯路。

费方舟

我非常同意所提出的建议。我认为高校教师或其他研究人员群体，可以转发给自己的学生，尤其是做文革研究的。发动他们很重要，这样学术才有后来人。

另外有个建议：是否在网上发个英雄帖？很多人，不同年龄层，职业和地域的人，其实都很关心文革研究的，他们也可以加入。我有九千粉丝，不是僵尸粉，经常有互动的，他们中就有许多是文革研究的热心人。

日出东方

同意，我已经给方先生发了自己的信息，也可尽到五项义务中的几项。但义务和权利并存，启事中五项都是义务，建议还应补充规定几项会员的权利。（会员的权利就是无偿获得本刊——方）

张从

方先生，我不熟悉，《记忆》变动的详情也不大清楚。但我愿意遵照所列五条之第一条：“每年采访一名文革亲历者”，作为成为会员的条件。

小林

写得很好！我自动申请为“会员”，你提出的五条，我尽力做到。（一条即可——方）

少杰

我是《记忆》的老读者，也曾写过几篇回忆录和访谈录一类的小文。

正值贵刊不断出新，内容愈加丰厚，形式也愈加规整之时，得《记忆》关于实行会员制的征求意见函。认真读后，我深感来函情真意切，然要将贵刊面临的难处一一解决，却绝非易事。两手空空，连“七八条枪”的家当都没有暂且不论，有多少人甘当志愿者义务服务也先放一边，让我最为揪心的是当下的……。话说回来，在贵刊眼下尚能正常编发的

情况下，我以为当务之急还是抢救史料，抓紧采访当事者和参与者，也包括围观者和起哄者。

曾有这样一件事让我懊悔不已。我家附近有一羊肉铺，老板乃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北京财贸系统最大的造反组织“财贸尖兵”的司令洪振海。震惊中外的1967年西单商场大武斗，他是主要指挥者之一，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之初，他又是委员之一，1968年即被捕入狱，主罪即是那场大武斗。蹲了十几年大狱后，他又复归本行。据知情者说，此人毫不回避文革往事，每每与当年“战友”及年轻好奇者津津乐道。我平日虽与这位洪老板有点头之交，但直到前几年其故去后，方知此公就是洪司令。扼腕之余，我为未能给《记忆》提供一篇采访这位文革当事者的记录文字而遗憾，并由此深感《记忆》应正视并积极应对的两大当务之急——

其一，目前，文革参与者或旁观者最小的也有六十多岁了，中坚力量七八十至九十多岁。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陆续凋零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记忆》需尽量创造条件，积极出击，采访、搜集健在者的谈话录、回忆录。

就此补充一点儿，进一步说明问题。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曾在北京四中任教，六十年代初为支援新建校调到安德路中学的孙荫柏老师，如今已98岁高龄。文革之初学生下毒手将其殴打之后，误以为其已死，竟塞进麻袋，准备投入护城河，后幸被一位校工救起，捡回一条命……孙老的遭遇，在某纸媒有过只言片语的披露，但并不完整，非常值得好好挖一挖，写一写。现在孙老年事如此之高，不堪回首（抑或追忆不清）往事，当年的红卫兵早作鸟兽散，安德路中学已不复存在，救人一命的校工也不知所踪，要将这段往事完整地敷衍成篇已非易事。

其二，近200期《记忆》，绝大多数文章反映的是学校的文革运动，而其他领域文革中的人与事则着墨不多。我想一是贵刊人手有限，触角尚不及深入各行各业；二是学校之外行业的文革经历者们心理状态各异，难成妙文。

对文革中形成某一地区各行业的大联合，并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群众组织的记忆，

贵刊没有涉及，如湖北的百万雄师、河南的二七公社等。如有可能，在这方面下下功夫，哪怕抢救出一鳞半爪，也是有意义的。

拉拉杂杂，颠三倒四，聊表寸心，总之，贵刊提出的会员5条件我原则接受，并尽可能达标。

老赵

作为读者和作者，我赞同实行会员制。动员青年学生，回家收集史料，让他们回家采访老一辈。这种想法虽好，但有些人不想让年青一代了解文革的实情，高校的课堂上也不准讲文革。把青年学生动员起来参与文革研究，会不会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而遭受打压？我有这方面的顾虑。■

慰祖

## 2、反对

方先生问得很有道理，他要“大展宏图”的魄力也令人钦佩。不过，要实行“会员制”，摊派任务，定量定指标，并“包产到户”，这不是“发动群众”，也不现实可行。读者各人情形不同，包括年龄、体力、时间、地位、经历、环境、兴趣等；各人才能亦不同，有人善搞资料调查，有人愿作文字思考；但还有些人很关注这些问题，却因种种原因不便参与，或发表看法，故不宜做硬性规定，“一刀切”。

且好的东西也不是“赶任务”、“交差”可以搞得出来的。《记忆》不是一本消闲时尚的出版物，既然“不要低估人家的觉悟”，那就相信她的严肃读者会为她的成长做出贡献的，当然，做为领导的主编，可以定期设置一些专题、专刊，做一些组织工作、约稿等，并定期调查询问读者喜欢或不喜欢哪类文章？《记忆》各期常刊登些读者回馈意见和读后感，是个好办法。

此外，即使《记忆》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提供一个保存记忆，思辨讨论、交流思想的平台，那也应努力扩大读者群，包括年轻人，以及海外的华人及非华人。即使许多人只读不写，那也很好。他们至少关心有关的历史，有兴趣来了解或思考。如果要求这样那样的“贡献”，《记忆》肯定做不大。不用说这会让许多读者止步，即使“会员”都按时“交卷”，人一出，到时方先生也会吃不消。

因此，我赞成对读者群结构做些调查和统计分析，并适当公布结果，让作者了解自己的对象群体，改进写作，但不应实行“会员制”，把它变成一个“孤芳自赏”的小团体。相反，应鼓励传阅散发，鼓励争议，只要刊物办得有内容，有质量，读者自然会增加。现在互联网发达，但每个网站都有自己有限的读者群，我想，《记忆》不应介意门户，一定要求“独家首发”，也不应只限于给“草根”作者一个发表写作的机会，而是应采纳百家之长，如有好的文章、独到的见解，也可适当转发或加以引导讨论，鼓励争鸣。

在新老交替之际，这些办刊的宗旨应当好好讨论一下，定下来。另外，在适当时候，也请介绍一下“接班人”的背景，让大家了解。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小鹰

### 3、疑虑与建议

关于方先生的办刊方针，我尊重，但有保留。

我感觉《记忆》刚刚转手，编辑方针就有变化，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要求读者为《记忆》出力，不能白看。这会局限《记忆》的读者群。你办《记忆》的宗旨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记忆》，更多的人关注文革研究，不论是否研究者、当事人。这样，很多关注者可以看到刊物。为此，你付出了太多的人力和物力。

方先生的方针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不出力就不要看，不怕你不看，并且每年都必须出力。这就势必把一批热心关注文革研究，但无力或无条件出力的读者拒之门外。实际上，我估计多数现有读者不可能每年写两篇足够被采用的文章，即使读者来信被刊发的可能性也不会很高。你过去真的是做义工，方先生不想让人白占便宜，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

如此看来不如收费。两条路：一条是作者免费；一条是非作者付费（成本费），倒也痛快。对于多数读者，付费容易，写出足够发表的文章难。年轻人更是写不出回忆录。新编辑方针可以理解，但不是争取更多读者的方针。或许身在国外，对国内的情况估计不足。

此外，可以用读者调查的方式请读者自愿填写个人信息，这种必须填写读者详细信息的作法，会让读者产生疑虑。这恐怕是与国外读者不同的。

总之，方先生用国外的“普世”方法，启之是奉献者的作法。这种方法，除了启之（还有老何），或许难以为继。真正做点事情很难。《记忆》能生存下去是第一要务。现在由方先生试试他的方法吧。我会配合。

红标

由于种种原因，文革研究本来就是很小众的事情，如何去找到愿意奉献的志愿者？设置会员条件我觉得是好事，可以调动一些人去参与这件极有价值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即使这样规定也未必有很多人愿意参与，结果会把本来就不多的读者弄得更少了。我建议实行双轨制，会员可以免费获取，非会员是否可以付费获取。付费多少由几位商量决定。我觉得，付一点费用还是有人愿意的。

郭力

方先生说得有道理。但实施起来，有点问题。

如果我没有想错，《记忆》的传播方式是一传十，十传百，这雪球滚成多大，是未可知的，是树状的。要实行的会员制想把最远端的枝杈都连接到中心来。可能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下层照样通过转发看到《记忆》，不会或不愿响应会员制，结果就跟没有这次的号召一样。二是每个看到杂志的人都积极回复，申请做会员，要直接获得《记忆》，那么，难不成每期都要发出成百上千封邮件吗？



什么”条件“，”承诺“，”成为会员“……感觉有点一本正经但跟实际脱节，还不如直接寻找志愿者，号召为抢救历史而进行采访更为直接和明确。

想对记忆的读者群做年龄、地域的统计工作，是做不到的，意义也不大。如果想在年轻人中传播《记忆》，得想别的办法。比如，到年轻人扎堆的网站去……■

忆陵

## 二. 野火度沧桑谈《记忆》

关注这些期的《记忆》，我有一些小小的感言，不成正文，敬请指点。

《记忆》对一些大事很关注，尤其是文革和很多著名人物，令人颇受启发，感慨不已。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我们是不是过于陷入精英视角了，文革当然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特别需要值得研究。以寸目之见，我觉得对中华民族伤害最大的很可能是50年代，而不是文革十年。50年代对整个基层社会的大清洗，土改不仅是对地主、农民的物质、肉体伤害，更大的伤害恐怕是精神世界的戕害。对他们而言，未来是什么？没有勤俭持家、发家致富当地主了，只有出卖良心去斗争去掠夺，在熟人社会里斗的你死我活。在镇反，相互之间也是杀得昏天暗地。在“三反”，整个斗争人员卷入800-900万人（刘少奇在青年团的报告），整个官僚机构斗的血流成河，自杀人数有人回忆到30多万（看到一个百度上说官方数据披露是11多万，不知是真是假，存疑）。大跃进大饥荒，用地狱炼狱形容当时整个“乐土”，或许已经褻渎了地狱炼狱的说法。目前关于大饥荒的研究远远不够，甚至不能说已经起步。曹树基教授、杨继绳先生的大作，当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作品。但是离事实真相还很远。曹教授教授在其大作谈到江西只有几万人的死亡数，我对此深表怀疑。起因很简单，我所在的镇当时就饿死非常多的人，用我父辈的话说是抬的到处都是。我去年回家也曾采访一些不同镇的那个年代的人，几乎是我问到了，他们都说饿死很多人。但是到底多少人？恐怕将是中国历史上永远无法说清楚的问题。曹教授的大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作品，史学家讲究一份材料说一份话，或许他已经做到个人

的极限。但问题是，中华民族这样一场灾难，如今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研究成果如此，恐怕难以向饿死的无数冤魂交代。这种大饥荒离我们很远？不，一点也不远，从国际上看朝鲜还时不时冒出饥荒的消息，从个人来看，我自己的叔叔是60年出生。我一直很奇怪为何我父亲6兄弟姐妹，就他矮得明显远低于全村水平，身体最弱。上次回家，我父亲告诉我，他能活下来，还得益于我奶奶是妇女干部。当时整个镇饿死很多人，他能出生都是奇迹。这是农村，但到学校我发现有很多60年出生的老师生龙活虎，青春有力，这种城乡之别令人惊叹。正是这种触手可及的时代的刻痕令我用了整整2年多才读完《墓碑》，每次都是看一会根本读不下去，时代的残忍令人感到灵魂的窒息。

我想问我们现在能否增加对50年代的关注，关注那个年代底层的命运变迁，他们的挣扎与努力。当然，我已看到上面很多有关这方面的十分精彩的作品，比如王海光教授论述一个教员的历史，极为精彩。只是能否有很大的篇幅？我不提倡对底层民众过于理想化、浪漫化的想象。底层民众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处置，相互之间的搏杀极其残酷。大规模的械斗，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劫掠。传统时代是这样，现在就远了吗？所以我会想，文革、5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过是将底层的斗争方式搬到了政治舞台，弥散化、扩大化。这场民族灾难，除了那些抗争者，是不是那个年代每一个人都要负责任？20世纪是一个道德崩溃的年代，平庸之恶的泛滥，每个人精心的利益算计，是不是都为这场现代性的大屠杀添砖加瓦？

当然，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我们首先要弄清谋政者的情况，毕竟底层有底层的生活逻辑，将责任推给底层每一个人，相当于没有人有责任，这又不公平。谋政者毫无疑问是要负主要责任，只是在弄清他们的责任并不够，我们需要理解这些悲剧发生的根源和文化土壤，从一个更纵深的视角去释读。而在其中我们不禁想问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到底如何？“反右”剥掉了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最后

一点遮羞布，影响到如今。如今竟然有人搬弄数学符号，号称大饥荒的数字来源是大跃进的人口流动，大饥荒不过是一场别具用心的文人的意淫。文章竟然登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号称中国人文社科最顶尖的刊物，忽略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令我极度震惊！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还是其他的物理、化学等科学，都有一个最起码的底线。一个是学术规范的底线，一个道德良心的底线。我认认真真拜读完他的大作，不可否认他遵循了学术规范的底线，用了很大功力，核对了很多材料（甚至把杨继绳教授《墓碑》上一些引用的地方志材料都核对了）。这种勤奋放在真正的学术研究会令人佩服！不过，放在明显出卖良心（看李若建的一篇大作，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学者，都无法否认大饥荒的存在）谋取个人私利的方面，却令人害怕。时到今日，竟然还有人这样干？他研究方法没有问题，只是一些研究方法根本无法印证他的结论。一个简单的常识，如果用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的史学规范，那么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鬼神材料，就可以印证出我们历史上有很多鬼神！问题是，用史学规范，难道我们可以用这些鬼神材料论证出中国确实有鬼神吗？在学术规范的基础上，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常识，一个对事实、对良心、对道德最起码的尊重！尤其是这种涉及无数灵魂的事件，只要深入底层社会，用严谨的口述访谈，问问那些经历那个年代的人，就知道一些大概了。搬弄一些看似高深的理论，除了遮掩这种，或许他们已不需要遮掩，而是光明正大的泯灭最起码的良知，谋取个人的私利。而社科院竟然发表，或许我们需要问平庸之恶，就不需要为一个时代的堕落而负责吗？

环顾现在的高校，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否认学校已然不是一个清净之地，名利场现象交相辉映。社科项目每年的重大项目都有现有领导的思想 and 治理政策。评称职看论文数量，不看质量。期刊论文首先看政治立场如何，再决定能否进入下一轮。政治立场又只是看你弘扬什么，而不是事实如何。在学校，看老师也是看多少钱，多能混。瞩目当今学界确实有很多触目惊心的现象，根源首先是政策有意识的诱导

和无形、有形的各种逼迫。现在高校年轻老师处境艰难，所以现在论文发表浮躁也可以理解。但把当今学界不良现象全部推给制度也不合理，很多老师是鼓风弄浪，有明显夺取宣传部的饭碗之嫌。或许，现在的人们只问生前事，不顾身后名，已是共识。但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就应该捍卫一个社会的良心，就算不能做到为天下苍生呼号，最起码也应该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而不是睁眼说瞎话，甚至揣测圣意，在历史重大事件上搬弄是非、浑水摸鱼。知识分子是什么？他是依附于这个时代，又超脱于这个时代。依附于的含义，不仅是他不能自己生产，而是当广大民众艰难挣扎，知识分子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粉饰，到头来自己也会随之灰飞烟灭。冷静思考，除了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发出了自己的抗议之外，50年代的知识分子几乎是整体沉沦，没有对底层民众的苦难发出声音，60年代知识分子自己也是惨遭迫害。如今社会的知识分子或许已经没有知识分子的意识，纯粹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丧失了一个时代良心的作法。

在如今这种情况下，《记忆》的出现和坚守简直就是划破当今大陆研究现状的一股清流，让我在思想苦闷之际，看到希望的火光。在此，我谨以向《记忆》的作者和编辑致以最大的敬意。一个社会的良心衰落了，但永远不死。它将会冲破道德崩溃的年代，走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吗？所谓正能量，其真实含义莫过于此。我希望《记忆》不仅可以在重大事件发出声音，也能对底层民众有所关注，更能在制度探讨、文化根源上推进我们的认识。现如今《记忆》已经做到极好，我所谓的想法只不过是想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是为感言，尚祈指正。■

2016年11月15日

## 【本刊声明】

##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xc1966@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